

话说

春節

萧放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话说春节

萧放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春节/萧放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25-5122-4

I. 话... II. 萧... III. 春节—风俗习惯—中国 IV. 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1551号

责任编辑 方晓燕 钮君怡

版面设计 田松青

封面装帧 严克勤

技术编辑 王建中

中国节庆文化丛书

话说春节

萧 放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24

印张 5.5 字数 60,000

印数 1-2,800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122-4/G·463

定价 20.00元

前言

春节，作为中华第一节，她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说特殊，因为她不像一般普通的生活文化现象，可以简单替换或改变。春节，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她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的情感的聚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回家团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过年不仅在于享受久别亲人相会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寻求文化的归属感与心灵的安顿。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相似的文化功用，而且春节更充满人情伦理色彩。

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时间中，人们以鞭炮的声响、年画春联的色彩、龙舞狮舞的跃动、迎春锣鼓的喧阗，迎接中国新年。中华民族是温柔敦厚、保守传统的民族，同时也是进取兼容、求变趋新的民族。春节作为中国的标志时间，充分体现着中国人的传统情怀与更新意识。每当春节降临的时刻，既是中华儿女温习家族传统、重演回归仪式的时机，也是精神更新、迎接未来之时。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王夫之说得好：“天地之化日新”。我们的春节虽然古老，但永远年轻。

目 录

[前言](#)

[一、春节的起源](#)

[二、春节的演变和发展](#)

[1. 汉代的正旦](#)

[2. 魏晋南北朝的元正](#)

[3. 隋唐的元旦](#)

[4. 宋元明清的元旦](#)

[5. 近代以来春节的沉浮](#)

[三、春节的传统习俗](#)

[1. 送旧年](#)

[2. 过大年](#)

[3. 迎新年](#)

[4. 新春礼俗](#)

[5. 正月十五“闹元宵”](#)

[四、文艺作品中的春节](#)

[1. 古代诗词中的春节](#)

[2. 小说中的春节](#)

[五、春节的现代意义](#)

[1. 春节是聚合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

[2. 春节是滋养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式](#)

[3. 春节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

[4. 春节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一、春节的起源



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它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以年终岁首为时间基础，在民俗中称为大年，其核心内容是除旧迎新，围绕着除夕与新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年节习俗。

春节，在古代称为岁首、正旦、元日、元旦等，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是在民国成立以后。由于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将春节等同于岁首，并且将年末也包含在春节系列活动之中，所以本书将从上古开始的年终岁首的年节祭祀与庆祝活动都囊括在传统春节范围之内。作为岁首新年，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至少两千年的历程，其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古人把握时间，重视天文、物候及人事活动等，年的时间周期概念应该在三代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掌握。《尔雅·释天》中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虞时代大概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以“载”称年，载是运载之意，表示时间的运行与变化；夏朝以“岁”称年，岁与收获、祭祀及天文星象有关。“岁”本为斧类砍削工具，也用来收获庄稼，当时庄稼一年一熟。庄稼收获后，人们要杀牲祭神，“岁”就成为祭祀的名称。这种每年一度的丰收祭祀庆祝活动，将自然时间分成了不同的时间段落。因此岁收之“岁”与岁祭之“岁”就逐渐成为特定的年度时间标记。商朝以“祀”称年，强调祭祀周期，这与商朝的文化特性相关；周朝继承夏代以农作物丰收为年度时间周期的记时传统，正式将年度周期称为年。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灰陶尊上的“旦”字

“年”的本义是农作物的丰收，甲骨文中的“年”字是表示人背禾的象形字，指收成。甲骨卜辞中常有“受年”、“受黍年”、“求年”等词语出现。《说文解字》中解释：“年，谷熟也。”在农作物丰收之后，人们要举行庆祝活动，祭祀神灵，感谢赐予，并祈求来年的丰收。由于当时禾谷一年一熟，人们自然将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商代并不特别看重禾谷成熟周期，而周朝以农业为立国的基础，农业丰收是王朝大事，因此直接以禾谷收获期作为年度时间名称。以农作物生长、成熟为时间段落标志是原始先民的习惯，它在一些后进民族中保存了很久。大年、新年由周代确定之后，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日子。《诗经·豳风·七月》中记载了周人禾谷登场后人们庆祝欢乐的场景：“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周人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之月，因此在十月末、十一月初过年，后世过年的热闹与过

年祝福在这里已经有着鲜明的体现。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历法虽不断修正变化，但岁首时间没有改变，年节也就固定下来。年是农业社会的时间标志，体现着农人的生活规律，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春节是古老的。同时，春节作为中国人的首要节日，年复一年地为人们提供庆祝与欢乐的机会，人们从春节民俗活动中获得一次次精神更新，同时也使社会关系不断得到增进。因此我们说，春节又充满了新鲜与活力。

二、春节的演变和发展



汉代确立正月初一为岁首开始，春节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与农耕、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因为朝代更替、时代变化，“春节”的名字和习俗有所不同，但人们对这个节日的重视却延续了千年。

1. 汉代的正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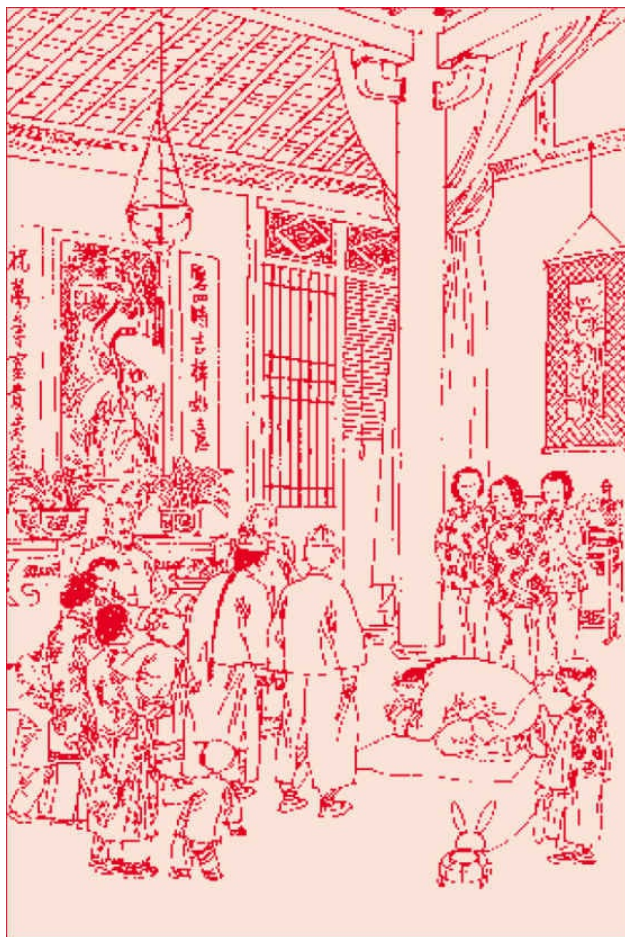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脱离早期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人们的岁时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依从自然月令的时间习惯逐渐改变，岁时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协调受到关注。作为岁首的春节，在秦汉以后社会意义明显，朝廷将岁首作为展示与加强君臣之义的时机，民间则作为乡里家庭聚会的良辰。

秦代至汉中期，岁首在夏历十月，十月初一为新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将岁首之月确定在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此后历代相沿。这样与四时中的立春节气接近，一年之始与四季之始的时间基本合拍，岁首新年与新春同时庆贺。秦朝的十月新年在汉朝称为“秦岁首”，其庆贺礼仪活动也保存下来。《荆楚岁时记》中仍有南朝时“秦岁首”吃黍米、肉羹的记载，再到后世，“秦岁首”演变为“寒衣节”。

汉朝中期以后，岁首在正月初一，称为正月旦、正旦、正日。正月岁首是皇家定历之后确定下来的，所以《史记·天官书》中说：“正月旦，王者岁首。”它与原始宗教的腊祭在时间上有所区别，但十分接

近，传统的部族生活以腊祭的第二天为“初岁”，人们以“一会饮食”的方式庆贺。正月旦是汉代皇家的重要庆祝日，朝廷要举行大规模的朝会，“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皇帝正月清早上朝，接受文武百官的庆贺，同时百官也得到新年宴饮的赐赠，这时礼乐齐鸣，百戏腾跃，鱼龙曼延，一片欢乐景象。正旦朝会更多显示的是歌舞升平以及君恩臣义的融洽景象。

在朝廷的影响下，“王者岁首”逐渐成为民俗大节，汉代民间将年节民俗活动由传统的腊日、腊明日移到正月之旦的“正日”。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了东汉时期民间正日的祭祀仪式与庆祝活动。首先，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是汉代正日礼仪的主要内容。在正日前的三天，家长与执事都要斋戒。正日是祭祀日，在家长、执事敬酒请神之后，全家无论大小，按尊卑等次列坐于先祖牌位之前，家人怀着喜悦的心情依次向家长敬酒致贺。“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觴举寿，欣欣如也。”为家长祝岁祈寿是自古以来的年节传统，《诗经·豳风·七月》中“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岁末饮酒祝福即是此意。岁首的酒品是敬神之酒，具有通灵的特殊效用，能辟邪祛恶、益寿延年。其次，拜贺宗亲乡党。正日家庭祭祀庆祝仪式之后，人们走出家门，拜谒恭贺亲族与邻里，利用年节时机，沟通自己与亲族、邻里的关系。后世正月拜年的传统即由汉代正日新年拜贺的习俗发展而来。



◆春节拜年

岁首卜年，是汉朝正旦的主要节俗之一。汉代人在正月旦预测一年水旱年成丰歉。《史记·天官书》记载：“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正月旦是与冬至、腊明日、立春并重的四种岁序列的开始日，也是重要的年度吉凶预测日。正月旦观测风向：风从南方来，大旱；风从西南来，小旱；风从西方来，有兵事发生；风从西北来，胡豆熟，有少量雨水，兵事促动；风从北方来，有中等年成；风从东方来，有大水；风从东南来，人民有瘟疫疾病发生，年成也很坏。还有看云的颜色，来占卜种植所宜。另外有一种从正月旦至正月初七观测雨水以卜年成的习俗，从正月初一开始，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数至七日，最高有七升之食。魏晋时期，根据正月初一至初七天气阴晴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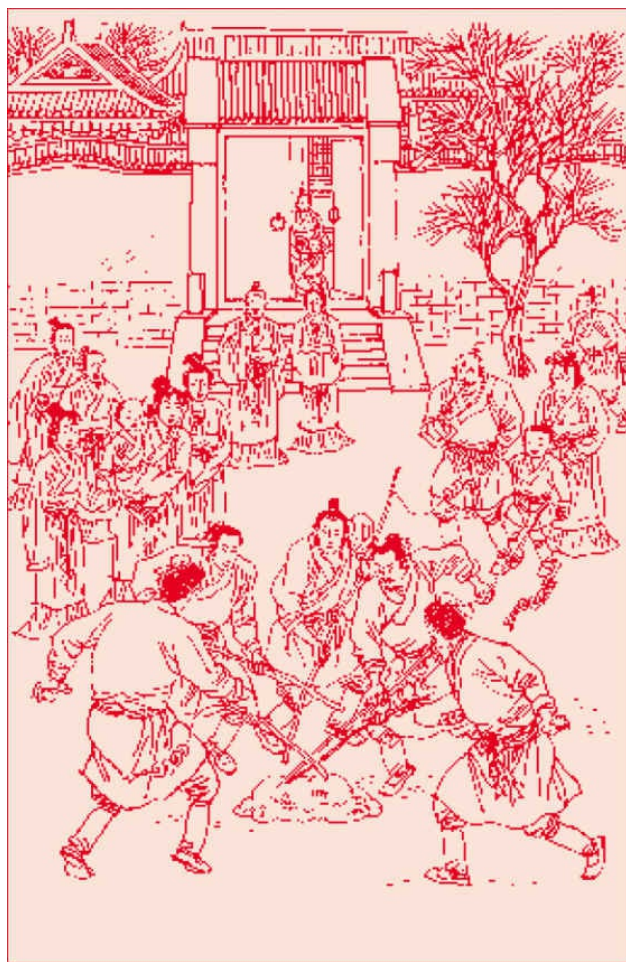
卜六畜与人口情况的习俗，大概与此相关。

2. 魏晋南北朝的元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岁首称为元正、元日、元会。岁首朝贺仍是朝廷大典，由于典籍缺载，对于魏时元会大礼，只能知道概略情形。魏司空王朗奏事说到岁首朝贺：“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宋书·礼一》）在华灯之下，岁首朝贺之仪，想必美轮美奂。曹植《元会》诗给我们描绘了当日的热闹情景：“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清酏盈爵，中坐腾光。珍膳杂遘，充溢圆方。笙磬既设，箏瑟俱张。悲歌厉响，咀爵清商。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载未央。皇室荣贵，寿考无疆。”穿着干净漂亮的衣裳，享受着珍奇的美味，徘徊在装饰华丽的殿堂之上，希望这种快乐永远持续，祝福尊辈万寿无疆。

由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我们能确知魏晋南北朝元日的具体节俗。该书为南朝人宗懔所撰，记述了当时荆楚一带岁时节日民俗。荆楚处于中国南北东西的过渡地带，其民俗荟萃五方，其节日民俗具有代表意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所谓三元，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也就是说正月初一是岁首、四时之首、一月之首。元日人们鸡鸣而起，先到门庭前燃放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然后一家大小都穿戴整齐，依次拜贺尊长。拜贺时要进奉椒酒、柏叶酒、屠苏酒等，人们在元日饮桃汤、吃胶牙糖，并尝五辛盘，即以葱、蒜、韭、蓼蒿、芥等五种辛辣味组合的菜肴，以在春日之初疏通五脏之气，还食用鸡蛋一枚，服

用中药“敷于散”（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搭配而成）一剂。元日的饮食目的在于强身健体、辟邪祈福。正如庾信《正旦蒙赵王赉酒》诗云：“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六朝元旦饮酒俗规奇特，它颠倒了以前饮酒从尊长开始的原则，顺序是从年龄小的开始，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而老人新年趋老，所以最后饮酒。



◆打粪堆 呼如愿

岁首卜年的民俗也很有趣。正月初一，人们以一串钱系在竹杖脚下，旋转着抛到粪堆上，说这样新年即可诸事顺意。传说商人区明过彭泽湖时，遇到水神，水神邀其做客水府，临行问他要何礼物，有人教区明，只要“如愿”。水神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原来“如愿”是水神的婢女。

自此之后，商人要啥，如愿就能满足他。后来在一年的正旦，如愿起来晚了，商人打了如愿，如愿逃到粪堆中，商人用竹杖打粪堆，喊如愿出来，如愿终究没有回来。这样就流传着正月初一打粪堆、呼如愿的风俗。



◆接紫姑神

六朝时还以正月初一至初七为新年预测日，董勋《答问礼俗》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人们以每一天的阴晴判定未来某物是否丰产，晴则丰产，阴则少产。六朝战争频繁，人口损失巨大，因此对人口的繁衍极为关注，人日也就成为春节期间特别重要的节日。人们在人日这天，吃七种菜合煮的菜羹，并剪彩绸为人形，或贴于屏风，或戴之头鬓，以祈人类之福。立春日，剪彩燕戴于头上，并贴“宜春”帖子，以应节气。正月十五，以豆糜、油糕祭祀门户，晚上

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紫姑是古代蚕神，传说她本是一大户人家的小妾，被大夫人迫害至死，死后成为预测年成及人事未来的神灵。人们通常在正月十五晚上做一个偶人迎接紫姑，迎紫姑的人手抓偶人，口中念念有词：“丈夫不在，大夫人已走，小姑可出。”如果觉得手重，就是神已降临。近代山东仍有正月十五“扎姑姑”的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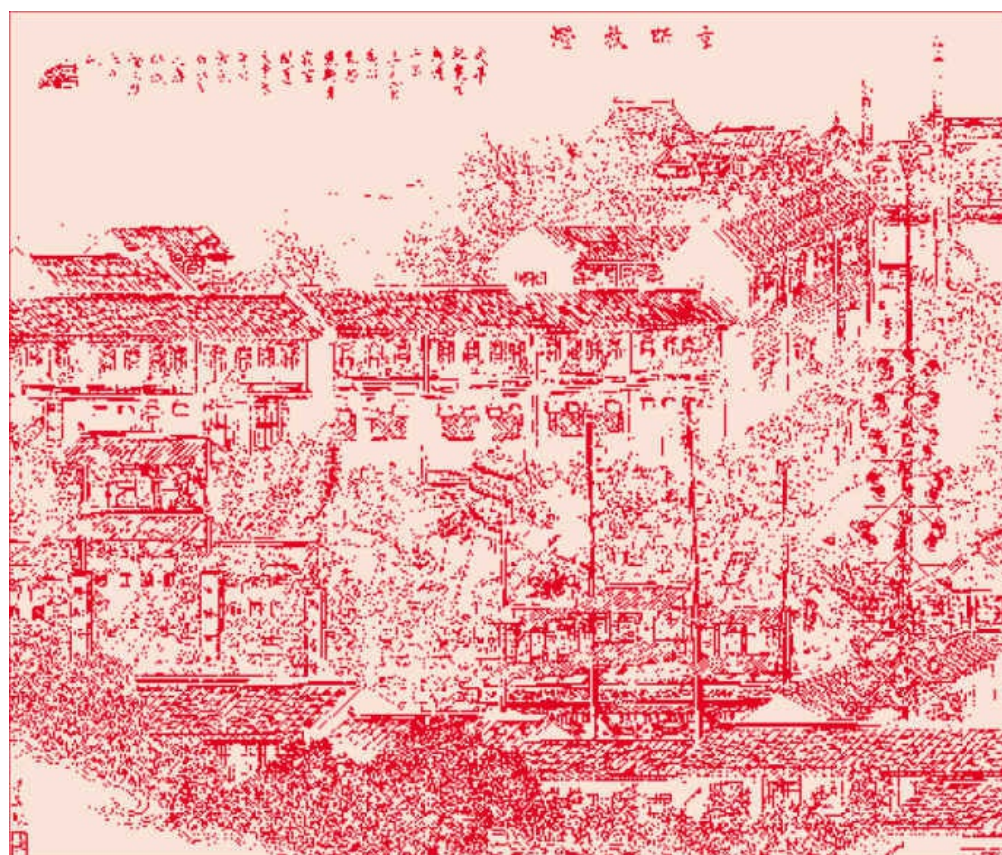
3. 隋唐的元日

隋唐春节，称为元日、岁日、元正。元日是新春的节日，“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卢照邻《元日述怀》）。从唐代开始，春节成为政府法定假日，唐开元年间《假宁令》规定，元日、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日七天假期是年前三天，年后三天。每逢元日，朝廷照例举行早朝大典，庆贺新年。“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由于早朝官员灯烛的繁盛，长安犹如“火城”。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拜表称庆，由内臣宣答。地方诸道贺表，由礼部员外郎接受，取其中官阶最高人的贺表一通跪读进贺。

民间元日合家团聚，设宴欢庆。白居易在江南与家人一道团圆度节，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有诗为证：“弟妹妻孥小侄甥，娇痴弄我助欢情。岁盏后堆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形骸潦倒虽堪叹，骨肉团圆亦可荣。犹有夸张少年处，笑呼张丈唤殷兄。”（《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元日饮酒，仍以年少者先饮。裴夷直便是“自知年纪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倘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元日饮酒是对年轻人添岁的祝贺，“称觴唯有感，欢庆在儿童”，同时也是对年长者的祝福，“但将千岁叶，常奉万年杯”。元日祈寿风俗非常流行。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日本僧人圆仁在长

安度过春节，他记下了当时的情形：“正月一日，家家立竹竿，悬幡子。新岁祈长命。”

唐朝人日风俗沿袭六朝，剪彩戴胜十分普遍。胜是一种具有特殊信仰意义的头饰，当时的胜大多用彩帛裁剪而成。唐诗中有不少描写人日剪彩的佳句，如李商隐所咏“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人日即事》）。唐朝人日剪彩更多地表现了节日欢娱的心态，请看余延寿《人日剪彩》诗：“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帖燕留妆户，黏鸡待饷人。擎来向夫婿，何处不如真。”人日赏春，是唐朝春节风俗，有人登高赏梅，有人歌舞纵酒：“人日春风绽早梅，谢家兄弟看花来。吴姬对酒歌千曲，秦女留人酒百杯。”（鲍防《人日陪宜州范中丞传正与范侍御传真宴东峰亭》）人日春风催开了梅花，主人与客人看花饮酒，宴乐于东峰亭上。



◆京师放灯：唐咸通十年正月二日的灯会

正月十五上元节，在六朝时期主要是与春节相连祭祀的节日。隋唐时期，上元放灯、观灯成为春节的重要节俗，元宵灯会的兴盛从隋唐开始，历代相沿。

4. 宋元明清的元旦

宋元明清各代，春节称为元日或元旦、新年。正旦朝会仪式依然是皇家的重要典礼。宋朝东京“正旦大朝会”隆重威风，皇帝端坐大庆殿，四名身材魁伟的武士站立殿角，称为“镇殿将军”。殿上陈列仪仗，百官皆着朝服冠冕，各路举人头名也身穿官服在朝廷站班。各州进贺官员各持地方特产品进贡，各国使者亦上朝入贺。

南宋临安的“元旦大朝会”大体如北宋东京，皇帝坐大庆殿，百官、地方进奏官、各国使臣皆立殿庭。内殿侍卫厉声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随班奏：“班齐！”宰相领百官舞蹈拜贺，禁卫人员高声喧呼，名为“绕殿雷”。枢密使等称贺声毕，登殿，弯腰站立，百官皆鞠躬听制。皇帝制曰：“履兹新庆，与卿等同。”朝贺结束，就殿给宰执群臣赐宴，外国使者次日就馆赐宴。宋朝的岁首朝会比唐朝更为严肃，显示着皇权的威严。

元朝学习了汉家仪制，岁首朝会亦隆重盛大。正月一日，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也是夜晚五更入朝。皇帝、皇后先后入坐大明殿，待司晨官报时，百官分左右从日精门、月华门进殿，分站两班，向皇帝、皇后鞠躬、跪拜，山呼万岁、万万岁。丞相上表祝赞：“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然后给皇上三进酒，教坊奏乐。

接着宣读中央与地方官的贺表与礼物清单，僧人、道长、耆老、外国番客依次进贺。

明代建国之初崇尚俭朴，对朝会之礼不大讲究。虽然在洪武元年（1368年）定了正旦朝会议，大略如宋朝元旦朝仪，但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在国家生活中没有多大影响。我们翻检明朝人的著述，很难看到人们对元旦朝会的记述，似乎朝廷上下对元旦朝会没有兴趣。人们元旦匆忙上朝、退朝，而朝官私下的民间交往却显得很热闹。即使在皇宫，人们看重的也不是朝仪，而是日常的节俗活动。隆庆元年（1567年）正旦，皇帝在宫中祭天，不用外面的特殊安排，祭品也不用太常准备。类似这样处理正旦朝仪，在明后期可能不是偶然的。

明朝是一个重农的朝代，特别重视与农事相关的立春节仪，从资料上看，立春仪式替代了朝会之仪。有一则事例特别典型地说明了明代正旦与立春的地位差异：正统十一年，立春正逢元旦，“礼部议顺天府官进春后，百官即诣班行贺正旦礼”（《明史·志第二十九·礼七》）。就是说由于元旦正好在立春这天，因此立春仪式之后，顺便举行元旦朝会之礼。

清朝元旦朝会成为朝廷例行仪式，“凡元正朝会，岁有常经”。清代春节期间的迎春仪式与明朝略同。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身穿朝服至东直门外迎春。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供案于午门外正中，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及用时花插成的春山。进春的物件由府县生员抬进皇宫，然后府尹主持鞭打春牛的仪式（《燕京岁时记》）。

帝王的正旦朝会作为国家典礼，场面宏大、壮观，它是国家时间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岁首庆贺仪式，年复一年地对君臣关系进行确

立，臣下向皇帝叩拜上寿，皇帝赐臣下茶酒，显示皇恩浩荡、与民同庆。盛大的朝贺庆典对内显示国家的太平，对外彰显中华帝国的国威。当然，春节朝会在中古社会前后也有细微变化。在隋唐以前，君臣关系相对融洽，有一些君臣同庆的充满生活情趣的节日。宋代以后，伴随着君权的强化，君臣关系相对紧张，朝会更多体现着森严的等级秩序，反复的叩拜与效忠性的万岁欢呼，更多表达的是仪式意义。朝会一结束，人们急忙忙赶回各家过自己民俗的年节。



◆乾隆过春节

宋元明清民间年节喜庆热闹，人们忙碌一年，就为了年底那几天的

高兴。北宋“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就是开赌禁三天，任百姓娱乐。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从早上就开始互相庆贺。家户店面均张灯结彩，平时的娱乐场所更是车水马龙，平时难得出门的贵族妇女也盛妆出游，到赌场观赌。贫户小民在年节也换上新洁的衣服，把酒相酬。

南宋，在民间，正月初一“谓之元旦，俗呼新年”，为一岁节序之首。杭州士大夫年初三日，交相拜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当时年节出门游览寺庙宫观的风气很甚，寺观游人整天不断。年节是人们聚会的良机，家庭宴会气氛热烈，“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梦粱录》卷一）。

两宋元宵街市灯火通宵达旦，歌舞百戏，杂耍表演，“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宋代元宵灯彩盛于隋唐。《程史》记宋宣和中元宵张灯，有夫妇在观灯中走失。妇人来到端门饮赐酒，将金杯偷藏怀中，被卫士发现，送到皇帝面前，妇女口占词一首，其中一句为：“窃取金杯作证明。”皇帝听后，一时高兴，将金杯赐给妇女，让侍者将其送回。南宋临安元宵热闹虽不及东京，亦“家家灯火，处处管弦”。民间歌舞杂艺表演得到官府的奖励与支持，据《梦粱录》记载，各种有名的舞队班社不下数十家，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乔迎酒、焦锤架儿、仕女、杵歌、竹马儿、村田乐、神鬼等。还有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府第中的家乐儿童等，亦“清音嘹亮，最可人听”，人们当街戏耍，竟夜无眠。

元朝官员在正旦朝会仪式以后，开始民间私人性的庆贺活动。如大都城内，京官虽然已经在官府聚会，但在民间仍行“岁时庆贺之礼”，人们相互迎送往还。年酒是一定要喝的，如果设席招待，就将食品排列于桌案之上。人们拜年贺节，往返于茶坊酒肆之间，活动要延续数天。直到正月十三日，街上开始发卖糖糕、黄米枣糕及辣汤、小米团等元宵节

令食品。市井商贩在街头搭起草屋，卖琉璃葡萄灯、奇巧纸灯、谐谑灯以及烟火爆仗之类。元宵灯火至十六日结束。

明朝正旦朝会不常举行，无论宫廷、民间都享受着节日亲情。刘若愚在《酌中志》中为我们记述的明朝宫廷的春节与民间春节大体一致：

初一日为正旦节，自年前腊月二十四日祭灶之后，宫眷内臣都穿上葫芦景补子及蟒衣。各家皆蒸点心，贮存肉食，准备一二十天的食品。年三十晚上，就开始互相拜祝，名为“辞旧岁”，大吃大喝，鼓乐喧阗，以为庆贺。

正月初一五更起来，焚香放纸炮，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当时也称扁食，即饺子。在饺子里暗包一二枚银钱，吃到这只饺子的人，意味着一年好运。这天人们相互拜访、祝贺，称为“贺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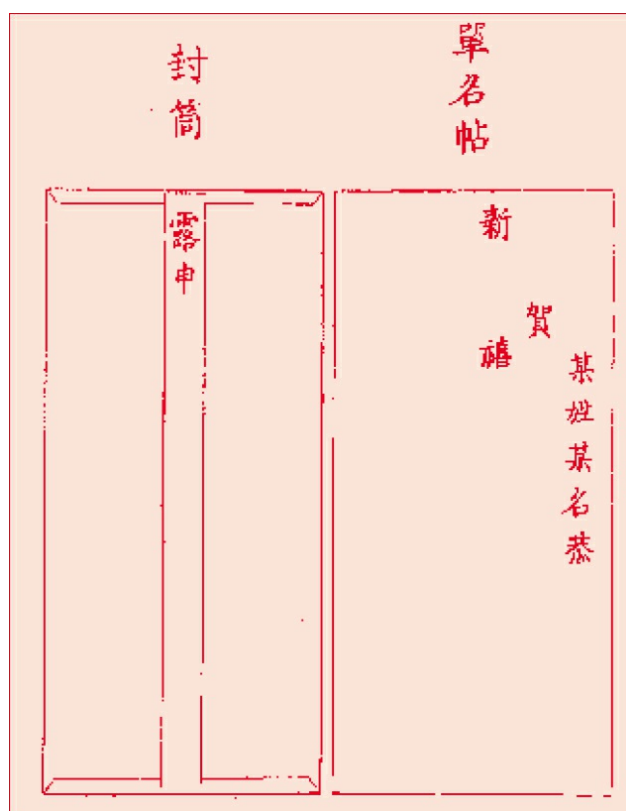


◆北京春节东岳庙会

北京民间春节更为生动有趣。当家人元旦晨起，率妻子等拜天地、

祖先，煮饺子，给长辈上寿。元旦出游，在路上碰到亲友，就在街上叩头。头上戴的花饰称为“闹嚷嚷”，是用乌金纸做的飞蛾、蝴蝶、蚂蚱等，大如掌，小如钱，男女大小“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正月初一，北京人上东岳庙烧香。初一至初三到白塔寺绕塔。初十至十六东华门外灯市繁华，“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相属，男妇交错”。

观灯的时间集中在三天，十四曰试灯，十五曰正灯，十六曰罢灯。元宵节期间，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夜晚均不关门，“任民往来”。正月十六妇女结伴夜游，传说这样就会祛除腰腿疾病，名曰“走桥”。到城门之处，暗中举手摸城门钉，摸中者，就意味着得到男丁的吉兆，名曰“摸钉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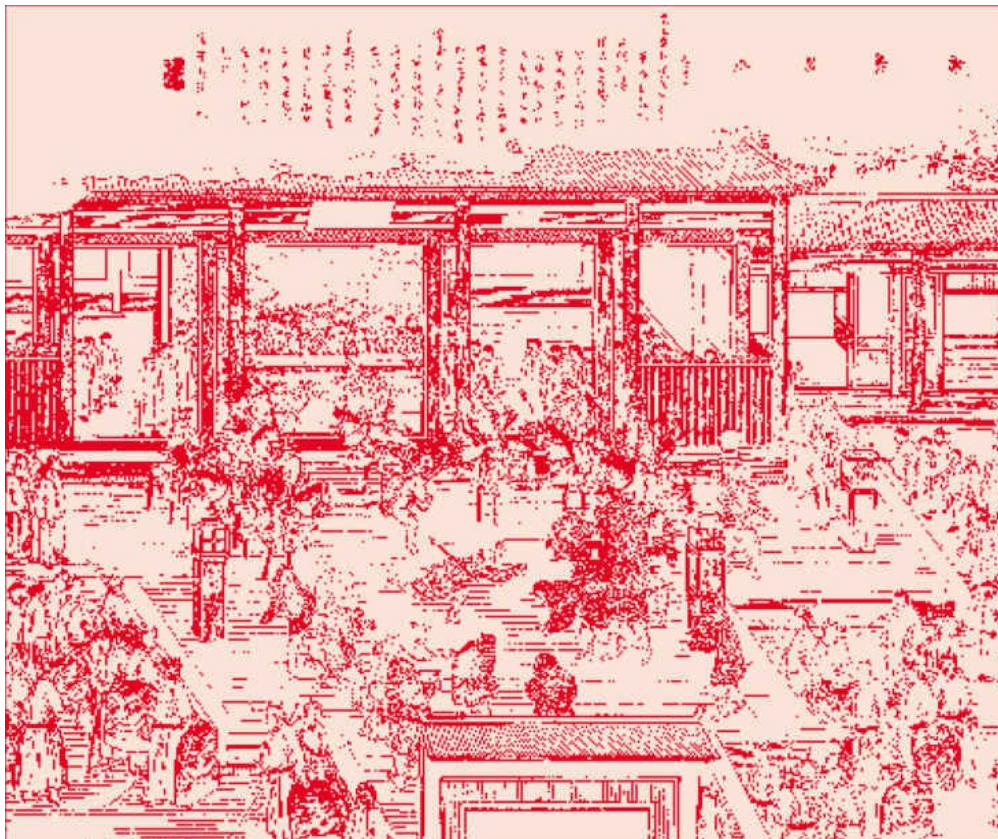


◆清代拜年名帖

清代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朝。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的“具柬贺节”，就是在红纸片上写上“恭贺新年”等词以及自己的姓名，在初三以前送给亲戚朋友。有的登门揖拜，朋友之间在门口互相拜贺，亲戚至友则拿出春酒、年糕等共贺新春。

晚清元旦官方朝贺之后，民间拜年庆祝活动迅速展开，“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燕京岁时记》）。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钹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传统社会作为岁首的春节，是官民共享的第一大节。官方每到岁首举行盛大朝会，以隆重的朝仪显示帝国的威严与统驭力，同时也借观看节日灯火与欣赏杂艺表演之机，表露出与民同乐的姿态，以求社会和谐。民间年节是历时一月的节日过程，特别重视除夕、新年与元宵，与官方朝会对应的是家庭与社会的贺岁礼仪。热烈祥和的贺岁礼仪，不仅加固了家庭伦理关系，增进了家人的亲情，同时也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与再造。



◆歌舞升平：清末的春节文艺演出

5. 近代以来春节的沉浮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民国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节日方面是官方节日与民间传统节日出现分离，春节在公共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当然民间社会仍一如既往地享受着自己的传统节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3日，

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2月17日发布公告：“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社会的阴阳合历体系，人们按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生活。在民国初年，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采取调和折衷的方式。

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头上。而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农历新年，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道：“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这样，由于政治变革的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在公历元旦；一是“国民新年”，在农历春节。公历元旦新起，没有任何民俗内涵，农历春节却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农历岁首，本来就在孟春正月，它很早就与立春节气（这是最符合自然时序的春节）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看汉朝以来迎接新年的节俗中，很多都包含着迎接新春的意思。所以民国时期直接将农历岁首称为春节，符合传统节日的内在性质，人们易于接受。而作为一般百姓，人

们照例称农历岁首为新年或大年。

激进的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全部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农历新年。但国民政府推行新历、废除旧历的效果并不理想。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以上均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民国政府取消阴历新年，一度雷厉风行。据时人记述，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不过这种做法，一二年后即消失，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文载道《风土小记》）。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以“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民国期间春节习俗与明清相比，唯一的大变化是，延续千年的官方朝会被取消，民国政府机关在公历元旦举行民国纪念日与新年庆祝活动。从民间习俗看较少变化，年节依然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结束。兹以南北两地为例，可见一斑。北京通县，元旦（农历春节）设香烛、果饼，拜天地，祭祖先，乡里往还叩拜，庆贺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备元宵祭神，燃灯花祭祖（民国《通县志要》）。南京，正月新年习俗如旧，“正月元旦至初五日，此数日中，每饭必祀祖。亲

戚友朋，互相贺年。虽民国改用阳历，十年以来，习俗未尝移改”（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民国具体年节习俗，我们在下文中将逐节介绍，这里不一一说明。



◆山村岁朝图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承辛亥传统，在历法上采用公元纪年法，但对传统年节给予特别关注。12月23日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法定假日及其放假日期。从此，“春节”成为社会上下对旧历大年的称呼。“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人们一度以过“革命化”春节的名义，试图取消春节假日，对春节传统习俗进行各种禁止与限制，但最终没有阻止人们欢度春节的热情。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传统节日也逐渐出现复兴趋势。春节作为中国民俗大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在回家过年的过程中尽情地享受着亲情、友情的快乐。春节不仅是居住在祖国的中华子民的共同节日，而且也是海外华人的重要传统节日。随着海外华人的增多与社会影响的扩大，欧美、东南亚等地，凡是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春节都成为当地中华文化的展示日。在美国纽约、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神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的中国城，每年春节都有较大规模的迎春联欢活动，春节为人们提供了聚会娱乐的机会，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创造了培植根脉意识的契机。

三、春节的传统习俗



节是迄今为止流传历史最久、流传地域最广、过节人数最多的中国节日。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第一大节，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节日。春节处在年度周期与四季循环的新旧交替的时间关口，其节俗丰富、生动，充满了人性伦理之美、情感之美、艺术与智慧之美。为了给读者全面呈现传统春节的面貌，我们伴随着中国人过年的脚步，依照年节顺序，渐次展开年俗长卷。

1. 送旧年

春节，俗称大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为了过一个好年，人们一年都在准备，腊月进入忙年的阶段。腊月在古代是举行腊祭的月份，它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神性之月，系列的祭祀活动都在腊月展开。近代社会虽然神灵信仰淡化，但其年俗祭祀传统依然得到传承。当然，人们更注意的是现实的年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准备，忙年，更主要的是忙年节室内环境的卫生与装饰，忙办年节食品、回家礼物等，年节因为人们准备过年的忙碌而显得生机勃勃。

（一）“腊八粥”

农历十二月初八名为腊八节。腊八节是年节的前奏曲，华北歌谣唱得好：“老婆老婆你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过了就意味着进入年节阶段。腊八这天人们要吃应节令的腊八粥，因此又有“报信儿的腊八粥”之说。

腊八节的前身是古代的腊日，腊日在上古时代是最重要的年终祭祀日。在神灵信仰浓郁的上古社会，人们认为人类的生存来源于自然神灵的恩赐，因此在年度周期更替之际，要举行盛大的神灵祭祀仪式。以前，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神灵祭祀活动，而在年终要举行总结性的祭祀，总结性的大型祭祀就确定在腊日，也就是岁末的几天举行。人们在腊日这天陈上祭品，祭祀上天与自然万物之神，同时也要祭祀祖先。腊日在上古相当于后来中国人的大年。

后世关于腊日只有片段记载，南朝时期腊日已经固定在十二月八日。《荆楚岁时记》明确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着胡人面具，扮作金刚力士模样驱邪逐疫。隋唐以后，灶神祭祀与驱傩活动与腊日分离，移到了岁末小年以后。腊八兴起了一个新的节俗，那就是吃腊八粥。

关于腊八粥的来历有种种传说，影响最大的是纪念佛祖成道的传说。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拯救世间的苦难，探寻解救人生痛苦的方法，放弃了安逸的王宫生活，到处苦行修炼，经常挨饿。终于有一天，释迦牟尼由于疲劳过度，又饥又渴，晕倒了。幸得一位牧羊女路过，将随身所带的杂米与泉水调煮成粥，给他食用。释迦牟尼吃完这碗粥，顿时精神焕发。他谢过牧羊女，继续苦心钻研，打坐修行，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释迦牟尼成佛这天就是十二月初八。佛门弟子为了纪念佛祖成道以及牧羊女舍粥救佛祖之恩，腊八日在佛教寺庙熬煮腊八粥，供奉佛祖，以示纪念，然后将粥分给穷人充饥御寒，施舍给众人实用，以示大慈大悲之意。因此腊八粥又称为“佛粥”。

当然，腊八食粥并不仅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就有冬至以赤豆粥祭神的习俗。腊八在冬至之后，将冬至粥移为腊八粥十分自然，就如将夏至粽子移到端午节一样。由佛教传说与佛门腊八施粥情况

看，十二月八日正好与佛教成道日合一，这样腊八节俗就多了一份人文宗教的色彩。因此腊八跟原始腊祭有了一定的区别，产生了驱邪与纪念佛祖的双重意义。

还有传说，朱元璋出来当皇帝之前，将乞讨来的各色米豆合煮成一锅粥食用，后来人们认为这样的杂拌粥能带来好运，因此大家都在腊八吃这种米粥。

腊八粥作为节令食品最早出现的时代很难考证，但从文献记载看，隋唐文献中找不到有关腊八粥的记载，宋朝之后却屡见于史籍，可见腊八粥至少在宋代已经十分流行。《东京梦华录》说北宋开封府十二月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北宋寺院、民间都有腊八食粥的习惯。南宋临安，寺院称十二月八日为“腊八”，寺院制作的五味粥，名为“腊八粥”（《梦粱录》）。

元朝人仍将腊八说成是佛家的节日，“是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看来在宋元以后佛教对传统节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元大都的官员、百姓在腊八同样吃红色的腊八粥，名为“朱砂粥”（《析津志·岁纪》）。明清时期腊八节，无论寺院、宫廷、民间都吃腊八粥。吃腊八粥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是日，家效庵寺，豆果杂米为粥，供而朝食”。清代北京腊八日在雍和宫施粥，北京雍和宫是清代皇家寺庙，雍和宫有两口大锅，据说每口锅可熬二三十石米。雍正皇帝曾经派人在雍和宫用大锅煮腊八粥，每年十二月初五或初六开煮，初八日进粥内廷，分送各王公大臣品尝。

腊八粥作为传统的节令食品，它有特定的食物配方与烹制方法。

《武林旧事》记载了宋代杭州腊八粥的配方，寺院、人家都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等烹制腊八粥。腊八粥的原料为米与果品，掺入的果品越多越好。明朝宫中的腊八粥烹制方法是：在腊八前的数日，将红枣捶破泡汤，到腊八早上，加入粳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粥（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民间虽然没有宫中讲究，但同样“杂五谷米并诸果，煮为粥，相馈遗”（《宛署杂记》卷十七）。清代北京家家煮腊八粥，腊八粥与明朝类似，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枣泥等，合水煮熟，再加入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子、松子，以及白糖、红糖、葡萄等，以增色提味。这些腊八粥的食料其实都有民俗寓意，桂圆象征富贵团圆，百合象征百事和睦，红枣、花生比喻早生贵子，莲心象征恩爱连心，核桃表示合合美美，桔脯、栗子象征大吉大利等等，人们以此期盼未来生活美好和睦。

（二）小年送灶神

腊八过了是小年，小年在北方是腊月二十三，南方是腊月二十四。如果说腊八是大年的开场锣鼓，那么小年就是大年的序幕。从小年开始，就进入了过大年的倒计时。各地有不少年节民谣，都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说的。河北邯郸民谣：“糖瓜祭灶二十三，离过年整八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赶集上店买东西；二十八，把猪杀；二十九，做黄酒；三十，家家捏饺子。”



◆三头灶神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三，祭灶王”等民谣里都说到祭灶，祭灶是传统小年的重要节俗。灶神俗称灶王爷、灶公、司命，是中国民间特别崇奉的神灵。为了理解腊月祭灶习俗的由来，我们不妨从历史文化发生的角度说起。

灶君的名称在战国时已出现，当时有人说晚上“梦见灶君”（《战国

策·赵策》)。据《梦书》解梦说，梦见灶神，担心娶妇嫁女。可见此时灶君信仰与人间婚嫁有关系。灶王的敬称大约出现在道教发展的唐朝，李廓《镜听词》中“匣中取镜祠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唐诗纪事》卷六十），就描述了夜晚取镜祭祀灶神的情景。灶神由君而王，它不仅仅是称呼的变化，表明灶神职司的扩大与地位的上升。民间至今仍有“二十四夜敬灶王，供上糯米打白糖”的俗谚。

以司命称灶神，是灶神神格的新变化。司命本来是文昌宫星神，主司人寿。古礼有樵燎之祭，积薪燔柴祀司中、司命。司命星神在汉代属于郊祀的对象，由“荆巫”祠祀。东汉时期民间“独祀司命”，这时的司命已偶像化，人们将一尺二寸长的木头刻成司命神像，无论出行还是居止都要奉祀（《风俗通义·祀典》）。由于司命祭祀方式是积薪燔柴，烟熏火燎的祭祀使人们易于将它与灶神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灶神中开始承担古代司命的职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灶神在每月的最末一天，都要上天报送一次人间过错，罪过大的人减寿三百天，罪过小的减一日。人寿原本由司命执掌，这时灶神却接过司命的职责。正是司命与灶神职责权限的混淆，后世民间才将灶神称为司命。司命在民间地位显赫，在南方乡村农家中堂上仍能见到“本门宗祖”与“东厨司命”并列的神位。

魏晋以后，灶神成为天神监察下界的耳目。他常驻人家，与百姓朝夕相处，监视着民间的一举一动，民间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碰碰，人们担心灶神打小报告，于是跟灶神套近乎，俗称“媚灶”。向神灵献媚是民间信仰的常见表现，不过在灶神祭祀上，表现得更为生动有趣。由于灶神与人关系紧密，人们对他既敬重又亲昵，常常在奉献祭品的同时，对灶神进行善意的调侃甚至戏弄。祭品各地各时期不尽相同，但荤类不外鸡、犬、羊、猪等，素类有麦芽糖、糯米团、瓜果枣豆等。汉唐时就

已用猪头祀灶，据说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

宋代民间依然传承着这一祀灶习俗，即使贫寒之家也不能免俗。传说穷愁潦倒的吕蒙正乡居时，逢腊月二十三日祭灶，蒙正不得已向屠户赊肉数两，当时肉店老板不在，老板娘可怜他，赊给他了。屠夫回来知道此事后，很生气地找蒙正要肉，这时肉已在锅，屠夫竟捞起而去。蒙正叹息，因焚诗代胙，诗云：“一炷清香一缕烟，灶君今日上朝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晚唐罗隐有类似的《送灶诗》。）

唐宋以来，一般人家都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认真地上演这类祀灶的短剧，范成大《祭灶词》对当时祭灶习俗有细致的描绘：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
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

范氏以诙谐的笔调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饶有趣味的江南祭灶图。宋人以这种请吃请喝、“送红包”的形式贿赂灶神，让他醉饱上天，不要议论人间长短，最好再带些年礼回来。

宋东京（今开封）人祭灶更有意思，在灶上贴灶马，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东京梦华录》）。让灶神醉醺醺地上天，糊糊涂涂地交差了事。但老让灶神这副醉汉模样，似乎也不太合适，于是人们

又采用了另外的方式——用胶牙糖即麦芽糖祀灶。给灶王爷进灶糖，最初的意义是封住他的口，使他不能开口说话；后来是送上封口费，祈祷拜祝：“辛甘臭辣，灶君莫言”；最后是吃了咱的糖，给我甜言蜜语，“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明陈荐夫《祭灶行》）。这种黏度极高的糖，不仅粘住了灶神的嘴，也甜了灶神的心。这样灶神就应人们所请：“好事传上天，坏事丢一边。”清代北京人用南糖、关东糖、糖饼祭灶神，用清水草豆祀灶神所乘的神马。



◆卖祭灶神的麦芽糖

对于不吃请的灶神，人们也有办法对付他。据说灶神平时要记人间过错，屋尘是他的记事本，为了去掉灶神的备忘录，在祀灶这天“家皆扫屋尘”。扫尘本来是为了干干净净过大年，民间却将它与祀灶活动串连起来，赋予它民俗意义，民间信仰就是这样服务着民众生活。

（三）扫尘

“二十四，打扬尘。”送走灶王爷，人们该清扫、洗涮，干干净净迎新年了。

自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灶神上天起，“俗谓百无禁忌”。平时人们对于屋内清扫是小心谨慎的，唯恐触犯神灵，现在将居家的灶神送走了，人们难得一个任意清扫的机会。



◆ 扫尘

扫尘，是年终除旧迎新的通行仪式之一，也是岁末的时空净化仪式，人们尽量将屋内上下、四壁角落、柜顶柜底清扫干净。清洁屋宇的扫尘虽然是实际的卫生行为，但在古代民众岁时生活中却是祭祀活动开始前必须进行的活动，具有清洁、净化人居空间的意义。

南宋在“月穷岁尽之日”，士庶人家“俱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梦粱录》卷六）。明清时期一般集中在腊月二十四送灶神之后，民间说灶神上天，家中清扫无所顾忌。清代苏州称为“打尘埃”，又称“除残”，时间在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蔡云《吴歆》云：“茅舍回春事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太平甲子非容易，新历颁来仔细看。”（《清嘉录》卷十二）就是说岁末扫尘要注意历书中对时日的规定，如果历书中有土神用事，就不能清扫，须在此日之前清扫完毕。一般来说二十四日是无忌日，所以民间都在此日清扫，不须另看黄历。

北京人在送灶神后，扫除祠堂屋舍，糊裱窗格。天津宝坻称扫尘为“扫舍”，为“除旧更新”之法。未扫之前，先祷告说：“土地奶奶躲躲儿，扫了房子供果儿。”如果是祭灶之后，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江西新城人以二十五日为“小年”，小年前后扫屋尘，有丧之家不扫除、不爆竹。福建与台湾人在腊月二十四诸神上天后，举行拂尘活动，拂尘又称“扫年”，家家大搞清洁卫生，重点是厨房，从灶台、锅盖、菜厨到门窗，将污垢清洗干净，以驱除家中一切晦气。闽台人通常用新扫帚作为拂尘的工具，并在上面贴红纸，以求吉祥。福建漳平人还要特意上山采一种“扫豚西”的灌木枝，绑在竹竿上，专门用来打扫天花板、屋檐等处。拂尘后，人们往往吃猪血滑茹粉，以清除吸入体内的灰尘。广东阳江人将竹枝或甘蔗尾叶绑在长竹竿上扫屋尘。竹枝扎帚寓意长寿，蔗尾叶则是“一年甜到尾”的意思。

有的地方是在祭灶前或同一天扫尘，为了解释这一节俗，民间有另一个版本的传说。说灶王爷将日常见到的家户言行都记在烟尘蛛网等账簿中，上天时灶王要带着这些记录向玉皇大帝汇报。人们为了让灶王爷没有凭据，就以扫尘的名义将这些灶王账册尽行扫去。无论怎样理解扫尘习俗，民间都将环境清洁作为空间净化的一个环节。

在山东滕县、莱阳、招远等地，人们在腊八节打扫卫生。据说，这天神仙离位，鬼神不忌。腊八与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是进入大年的不同起点，以扫尘作为驱邪的动机则具有同一意义。

（四）备办年节食品

祭灶之后，在“二十五，磨豆腐”的民谣声中，人们进入年节食物的准备阶段。磨豆腐过年，是传统社会年节民俗项目。每到小年之后，人们就为年节食品忙碌，每家都要磨上一些豆腐，做豆腐干、豆腐丝、豆腐圆子等，豆腐谐音“兜福”。豆腐干，闽南人称为豆干，谐音“大官”，过年有这样的彩头当然好。

年节食品当然不仅是豆腐，大年是一年的盛节，食物的丰盛是大年的典型特征。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儿盼过年”，大人希望年成好，小孩盼望年节早早来临，因为年节有许多平时难得的吃食与娱乐。年节食品最能体现民俗的统一性与地方性。

全国共享的传统年节食品是年糕，制作年糕的原料有糯米粉与黏的黍米面两种。早期社会黏性的米糕是年节祭神的供品，当然人们在祭神之后，可以享用，所以它逐渐成为年节的标志性食品，过年必吃年糕。过年吃年糕，意味年年俱高，祈求一年更比一年好。明代北京人年节准备黍米糕，元旦起床即吃，称为“年年糕”。顾禄在《清嘉录》中记载了晚清江南春节食用年糕的风俗：年糕是苏州年节的主要节令食品，它也用于年夜祀神，岁朝供先，同时还馈送亲朋。



◆北京年糕

山东年节蒸糕也很典型。从前蒸年糕，从腊月初一直蒸到腊月底，蒸出的食品吃到二月二，才是好人家。其中，枣糕是最佳的食品，大枣糕重达十斤，造型美观，花纹生动，缀以红枣，特别诱人。山西、河南的花糕也极精致漂亮，当然也得先由神来享用，然后再由人来分享神的恩惠。

馒头也是传统年节食品。晋人束皙《饼赋》称：“三春之初，阴阳交际。寒气既消，温不至热。于时宴享，则馒头宜设。”可见一千多年前，就有春节蒸馒头的习俗，馒头是阴阳交替时节的应时点心之一。河南人腊月二十七开始蒸馒头，“二十七，蒸着吃”。无论贫富，过年都要蒸馒头，馒头用来自己吃、待客人，或者作为拜年礼。穷人家的馒头吃到“破五”（正月初五），富裕人家馒头可吃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

南方主要是蒸年糕，但也有蒸馒头的。苏州年节有蒸“盘龙馒头”的节俗，市场上卖一种巨型馒头，在馒头上用面粉制作的一蜿蜒的盘龙，上面还插有各式吉祥的象征物，这是专门用于过年祀神的祭品。

南方年节多有米粉制作的糕饼。福建、台湾等地，在腊月二十四祭灶后，进入“年兜”（年底）阶段，家家户户备办年节食品，鱼肉、蔬菜、瓜果、糕饼是一般人家必须备齐的。过年所用的鸡鸭，要在除夕前宰杀好。许多地方杀鸡还有讲究，拔鸡毛时要留三根鸡毛，意思是有头有尾。煮鸡时要使鸡头与脖子成“之”形，使头背成昂首状，两腿往后伸直，俗称“金鸡报晓”。体现闽台年节特色的地方食品是各种糕粿。糕粿种类很多，主要以糯米粉为原料，加红糖在火上加热，搅拌均匀，停火，稍凉之后，手工包馅，做成圆形，然后用粿模印制成圆形或椭圆形，在粿底涂点花生油，垫上香蕉叶，上笼蒸熟，作为祭祀与享用的年节食品（方宝璋《闽台民间习俗》，第277页）。

广东人从腊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家家浸米舂粉，精心制作糯米糍、油糍、米粉饼、鱼丸等传统食品。春节的米饼必有煎糍、松糕，以象征团圆发达。煎糍又叫煎堆，制作方法是以糯米粉加糖搓匀，捏成球状，放到煮滚的食用油中油炸，使其中空膨胀。松糕，用米粉加糖，再加上适量的酵粉发酵蒸成，然后切成小块待客。客家人习惯用钵蒸，因此叫“钵仔糕”。

年节中人们制作较多的是易于保存的油炸食品与炒货，如炸麻花、炒花生、薯片等。湖北人从腊月中下旬开始，无论城乡，家家户户做炒货，名为“炒腊锅”。

年节糖果也是必备的，因为小孩儿到家里拜年，一定要用糖果等招待。旧时北京过大年，无论贫富，家家都要预备的一种食品，名叫“杂

拌儿”。“杂拌儿”是一些甜的干果、芝麻糖等的混合，据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杂拌儿大体上有瓜条、青梅、蜜枣、山楂糕、花生粘、核桃粘、麻片、寸金糖、豆沙馅芝麻糖、雪花馅麻糖、油枣、枇杷条、小开口笑、糖莲子、米花糖、虎皮花生、虎皮杏仁等等。

当然，年节食品中最重要的是猪肉，过年一定要有猪肉，不仅年夜饭要作为主菜，同时要用猪首作为供奉祖先与其他神灵的祭品。许多人家养有年猪，等到年底宰杀。年底几天，杀猪的屠夫最忙碌，东家请、西家接，忙得不亦乐乎。湖南桃花江一带杀年猪谓之“宰年宝”。湖北东部杀年猪，称为“福猪”，杀猪那天主人家要请四邻喝猪血酒，席上一定要吃猪血食品。没有养猪的人家到年集上买年肉。人们除了留下猪头与几块过年食用的猪肉外，其他都用腊水加盐腌制，然后起卤风干。湖南、湖北是用松柴或茯苓皮熏干作为腊肉，留待日后待客或自己享用。旧时农村富裕人家的腊肉可以从年头吃到年尾，一般人家在夏季农忙时还有腊肉招待帮工者，吃了大块腊肉，干起活儿更有劲。

（五）“洗疾疾”与剃年头

忙完了年节食品的准备，人们开始沐浴斋戒迎接新年。沐浴祛秽是旧时年节的主要习俗之一。在年节过渡仪式中，为了将过渡时间变成特殊的净化阶段，人们不仅以驱邪、送神的形式实现时空净化，就是人体自身也需要洁净，以除旧迎新。除日前人体洗浴、去秽习俗，来源于上古祭祀前的斋戒沐浴。关于年节沐浴的文献资料较少，古代官员有休沐制度，民间情形较少被记载，估计年前沐浴的习惯会有较长的历史。

《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了清代民间岁暮沐浴的习俗，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北京俗谚：“二十七，洗疾疾；二十八，洗邋遢。”这种俗谚在今天的湖北东部仍然流行。人们忌讳在腊月二十九日

洗澡，俗谚有：“二十九，洗老狗。”湖北西部鹤峰人在除日“浴身”，称为“洗隔年尘”，也称“洗邋遢”。土家族人在腊月二十八将被子、衣物全部洗干净，全家老少用艾蒿煎水洗澡。

江苏常州人在腊月二十六日洗澡，称为“洗福禄”；二十七日夜浴，“谓洗啾唧，祓除之意也”。

河南人在扫尘之后，就开始洗浴，为了提醒大家年底早点洗澡，人们也编了一首民谣：“二十四洗精神儿，二十五洗傻姑，二十六洗脚臭，二十七洗傻妮儿，二十八洗傻瓜，二十九洗傻狗。”总之，年澡是早洗的好，要不就成傻狗了。

不过据近人邓云乡说，旧时北京人在年三十晚上洗澡，特别是商铺的小伙计、帮工和徒弟，他们一定要在年三十晚上吃祭神酒之前洗好，即使一年不洗澡，年三十的澡必洗。人们洗澡不仅是卫生，更是祭祀的需要，大年洗澡意味着洗去一年的寒酸、一年的尘垢、一年的霉气。年三十这天，北京城的大小澡堂，照例天一放亮就开始营业，一直忙到午夜过后，年初一五更天才“下吊挂”，上板休息（《增补燕京乡土记》）。

岁末人体的清洁行为是一道必需的仪式，除了洗浴之外，还有剃年头，俗谚说：“有钱无钱，剃头过年。”在岁末一定要剃好年头，干净地过年。因此年根岁末，大小理发店都爆满。旧时有剃头挑子上门服务，虽然手艺不是十分精巧，但的确方便。旧俗正月是不能剃头、理发的，传说如果剃发，就会死舅舅。因为有这样的禁忌，民间一直等到二月二龙抬头后，才开始剃头。我们今天在北方还能看到这样的习惯。

在岁末阶段，人们可以通过沐浴及其他祛秽方式，使自己面目一

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六）装饰门户

清洁沐浴之后，人们就要装点门庭，所谓“二十八，贴花花”。“贴花花”包括贴春联、门笺、年画、窗花、剪纸等。

年节环境装饰中，人们最重视家宅大门的装饰。门饰节俗起源很早，它源于古人的信仰观念。古人认为人居空间是与外在的神秘空间隔离的自我保护空间，门户是唯一与外界交通的孔道，为了防止外来的侵袭，驱邪避灾，人们要挂桃符、贴门神。同时门也是迎新纳福的通道，所以人们在新年之际，特别重视门的美饰。



◆门神神荼与郁垒

我们先说门神，最早的门神是桃木刻成的偶人，这在先秦时期已经

出现。汉代门神已演变为两个人形图像，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神荼与郁垒。传说神荼、郁垒是两兄弟，住在度朔山的大桃树上，专门负责捉拿祸害人间的恶鬼。由于神荼、郁垒有如此的神异作用，后来人们就将他们的形象画在门户上。门神画是绘有门神形象的图画，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门神在后代不断增加，主要有钟馗、秦叔宝、尉迟敬德几位。

钟馗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大鬼王。据说唐开元年间，玄宗因犯疟疾，患病将近月余，巫医束手。有一晚，玄宗梦见两个鬼，一大一小。小鬼穿绛红色的衣衫、短裤，光着一只脚，腰插一纸扇，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玄宗的玉笛，绕殿而奔。这时一个头戴帽子、身穿蓝色衣裳、裸露一臂、脚蹬短靴的大鬼，抓住了小鬼，挖了他的眼睛然后吃掉了他。玄宗问大鬼：“尔何人也？”大鬼奏曰：“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钟馗说自己是武举不中之人，死后仍要尽忠圣上。唐玄宗一梦醒来，疾病顿愈，身体比以前更好了。于是召画工吴道子，据梦中印象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唐玄宗为了表彰钟馗打鬼有功，特地下诏：“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钟馗经皇帝这样一宣传，名声大震，成为唐朝岁末驱邪的鬼王。宋朝皇帝命画工将钟馗像刻版印刷，在岁除夜赐给宫内人员。



◆钟馗

秦叔宝、尉迟敬德是唐朝开国功臣，两人成为门神，也是因为他们威震鬼邪的英名。传说经历了残酷的隋末唐初的战争之后，唐太宗经常梦见鬼魅在寝殿门外呼号，晚上常常不能安睡。于是让秦琼和尉迟敬德晚上站在寝殿外，为其守门。果然，太宗没有再受到鬼魅侵扰。后来就将他们两人的画像挂在门上，作为驱鬼的门神。此后两人成为民间通行的门神，人们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的画像用纸彩印，年年除夕贴在门上。



◆门神秦叔宝与尉迟敬德

当然，人们对钟馗也没有忘记，至今三位门神仍存于民间。人们在单扇门户上贴钟馗，在双扇门上贴秦叔宝、尉迟敬德，也有人还传承最古老的门神，直接在两扇门上分别写“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名字。

门神画后来扩大了使用范围，变成年节时期装饰屋宇、增添喜气的年画。《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了当时开封的年节市场：“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其中门神、钟馗、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就是当时典型的年画题材。古代门神画中多画鹿、喜、宝马、瓶、鞍等象征物，“皆取美名，以迎嘉祉”。有一首《咏门神》诗曰：“金碧家家灿，迁除岁岁忙。侯封沿汉号，剑佩俨唐装。”即是说门神自汉至唐的一脉相承。明代北京宫廷、浙江杭州过年都贴钟馗、福神、和合二仙等年画。

清代苏州桃花坞门神画，“彩画五色”，多绘温元帅、岳元帅，而且多由远方商贩运往外地。天津宝坻人在扫舍之后，就贴年画，有《孝顺图》、《庄稼忙》等。当地小儿最喜欢贴年画，大人给小儿解说年画，寓教于乐。如《乡言解颐》作者李光庭所咏：“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年画”一词就正式出现在《乡言解颐》一书中。

最早的年画印制基地可能是开封及开封附近的朱仙镇，朱仙镇的年画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的民间传统。江苏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都是近世以来著名的年画产地。年画题材广泛，喜庆吉祥是年画的主题，如鲤鱼跳龙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岁寒三友、福禄寿、群仙赐福、天官赐福、招财进宝、文武财神、摇钱树、龙凤呈祥、天仙送子、榴开百子、新春大吉等等是常见的内容。民间年画还是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的有效载体，在年画中常见有：哪吒闹海、长坂坡、空城计、秦琼卖马、四平山、罗通扫北、西厢记、三娘教子、盗仙草、天河配、王小赶脚、钟馗嫁妹、老鼠娶亲、三岔口、忠义堂、文姬归汉、梁祝因缘、铡美案、魁星点斗、刘海戏金蟾等，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

年画作为民间的艺术，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人们在继承传统年画题材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年画，如骑车仕女、抗战门神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柳青的齐健隆画店印制了一种宣传办学堂、满汉平等之类内容的“改良年画”。民国初年，上海商人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选用传统年画或新式风情题材，配上公历纪元和阴历的月份，名为“月历牌年画”，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后来它发展成为当代广泛通行的新年挂历。我国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简洁，色彩鲜明，

画面热闹。建国以来的新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丰富多彩，深受群众喜爱。



◆年画：鱼龙变化

桃板、桃符，以及后来普遍出现的春联是新年大门的重要饰物。宋代以前门口悬挂的是桃符，桃符上写有“辟邪祈福”字样，桃符一年更换一次。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名联的作者，由他撰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敦煌文书中虽然发现有类似后世春联对仗工整的文字，但是否为年节春联，还难确定。）古代还有一种“宜春帖”，原来是立春时写的单句的吉利话，贴在门楣上。这也是春节贴春联的来源之一。明朝之后，过年贴春联成为普遍的民俗习惯。



◆春聯與門神

春聯的最初起源雖然是在唐末五代，但以紙寫聯語、普及社會的時代應該是在明清時期。清人陳尚古《簪雲樓雜說》記載，明太祖朱元璋特別重視過年貼春聯。明太祖在定都金陵之後，除夕之前，特地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明太祖微服出行，見一人家沒有貼春聯，經詢問，原來是一個閹豬的，他還沒有請人寫春聯。明太祖一高興，就揮筆寫下了如下聯句：“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下是非根。”這雖然屬於民間傳說，但也說明明朝春聯比以前普及。明人劉侗有“東風剪剪拂人低，巧撰春聯戶戶齊”的诗句，即是明證。

在清代，隨著春聯習俗對民眾生活影響的深入，迎新春聯替代了桃符，所以《燕京歲時記》說：“春聯者，即桃符也。”光緒《德安府志》記載：除夕“家家大門貼神荼、郁壘，曰門神，並以紅箋書吉語，曰春

联”。从桃符到春联，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精神演进的标志。桃符重在驱邪，春联意在求吉，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民众心态的变化。

清代，北京从进入腊月开始，就有文人墨客在市场店铺的屋檐下摆开桌案，名曰“书春”、“书红”、“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一些读书人给人书写春联，赚些润笔钱。在祭灶之后，人家就开始陆续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



◆ “大年好”窗花

苏州人岁暮时节，也要更换春联。“吴俗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这一习俗传承到晚清更为兴盛，在除夕前数天，街市上有专门写卖春联的，并在门口挂起“春联处”的招牌。春联内容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以及“家声世泽”诸语；有的集录古代诗文佳句，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等。这样求吉祈祥的联语是“岁岁用之，比屋皆然”。

如今，城市、农村还流行新年贴春联的习俗。现在的春联一般是对偶的上下两联，写在红纸上，贴于门户两边，字数一般在三字以上不等。春联讲究平仄格律，结构对称，对仗工整。门联有上下之分，一般说来，以末字音律判断，仄音为上联，平音为下联。上联贴在门左，下联贴在门右。也有人以门楣横批的首字左右位置确定上下联语的位置。对联多吉祥语，如“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时雨染成千里绿，春光不让一人闲”等等。横批一般为四字吉语，如“喜迎新春”、“紫气东来”、“万象皆春”之类。

2. 过大年

大年三十，在中国人生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虽然在北国地区有时这一时节还霜雪满天，但在中国人心中，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就连叫花子，也有三天年。我们可以在一年中东奔西走，四处漂荡，但这天必须回家，“一年不赶，赶年三十晚”，只有回到了乡里庐墓之地，回到父母的身边，我们的身心才得以安顿。也只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才能深刻地体味“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句诗的动人魅力。

（一）年夜饭

中国人从有“年”的概念开始，就有了年夜饭，年夜饭来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年”是丰收的标志。上古社会，人们种植的庄稼丰收了，就要感谢神灵的赐予，感谢的形式就是祭祀，祭祀的祭品自然是收获的东西。古代年终大祭是蜡祭，用食品祭祀百神。随着家族社会的发展，多神祭祀逐渐演变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腊日之祭，人们杀猪宰羊，就是为了祭祀祖先。《诗经·豳风·七月》中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

寿无疆”的描写，这里的公堂大概也就是后来汉代《四民月令》中所说的供奉先祖牌位的祖屋，人们在此饮宴团聚。

中国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也是人神共进的晚餐。逝去的各位亲人都被主人一一招呼、请回。只有等各位先人用过年夜饭之后，人们才开始享用。



◆年夜饭

年夜饭，又叫年羹饭、年更饭、分岁筵、团年饭等。明清时期，“合家聚饮”又称为“分岁”或“团年”。明代，北京人在二十四日祭灶后，各家皆蒸点心，储备肉类，准备二十天的食品。三十日岁暮，即互相拜祝，名为“辞旧岁”，“大饮大嚼，鼓乐喧阗”以庆贺（《酌中

志》）。在杭州，上祀祖先之后，“家人父子群聚欢宴，祝颂而散，谓之分岁”。

传统的年夜饭，菜肴充满寓意。《金陵岁时记》记载了南京人除夕的“十景菜”，人们把酱姜、瓜、胡萝卜、金针菜、木耳、冬笋、白芹、酱油干、百页、面筋十种菜，细切成丝，以油炒之，谓之“十景”。还有用干马齿苋做的安乐菜，用黄豆芽做的如意菜等，都取其吉祥之意。苏州人吃年夜饭，俗称“合家欢”。在年夜饭的菜肴中同样也有安乐菜，不过它是用风干的茄蒂杂拌其他果蔬做成。人们吃年夜饭，下箸必先夹此品，以求吉祥。中国南方地区的年夜饭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南方俗称圆子，象征团团圆圆。旧时山区穷人弄条鱼过年不容易，有的地方就要用一条雕刻的木鱼代替。现在有人发明了新的年鱼菜，就是以糯米为原料的糍粑鱼。糍粑鱼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味道鲜美。

在闽南，年夜饭是家庭亲情、希望的集中表现。许多食品是特地为过年而做，有象征意义，一些菜品不可少且不可不吃，如韭菜。韭菜是新春尝新之物，也是初春祭祀神灵的时鲜供品。后代取“韭”与“久”谐音，寓意年寿长久。家人拥炉围桌而坐，长辈念着“韭菜春，吃有剩（春）”，带头先吃一撮韭菜，全家跟着动箸吃韭菜，边品尝佳肴，边互相祝福，其乐融融。这大约是《诗经·豳风·七月》中上古岁末“献羔祭韭”场景的现代版。还有豆腐，“豆腐”与“斗富”谐音，寓意丰裕富足，民间有“韭菜春，豆腐福”之说；芥菜或菠菜做的长年菜，表示长寿；萝卜，闽南语叫“菜头”，与“彩头”谐音，寓意好兆头；竹笋，寓意节节高；肉圆（丸）、鱼圆（丸）加上家人团圆，合称“三圆”；还有用整只鸡做年夜饭的菜肴，闽南语“鸡”与“家”谐音，表示全家福；油炸品，寓意兴旺等等，不胜枚举。饭后来些甜品，寓意生活甜蜜；吃些柑桔，寓

意吉祥如意；啃点甘蔗，寓意节节甘甜、步步高升。

传统北京人的年夜饭中必定有荸荠，谐音“必齐”，就是说家人一定要齐整。年饭菜祈求吉祥的象征意义很早就有了。

年夜饭当然有南北地域的差异。南方除了菜肴外，要吃糍粑或年糕。北方一般吃饺子，饺子是一种以面皮包馅、形如半月或元宝的面食。饺子是中国北部的典型民俗食品，人们认为“好吃不过饺子”。饺子在中国起源很早，可能是从馄饨食品中分化出来的节日食品。半月形的馄饨可能就是后世饺子的前身。馄饨是中国古代冬至年节的节令食品，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后，冬至的节令食品也就迁移过来，作为岁首的应时食品。

饺子最早出现，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现今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唐朝已经享用饺子美食。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发现了饺子实物，虽然这肉馅饺子已经完全风化，坚硬如石，但饺子的花边仍清晰可见。饺子在元明时代称为“扁食”，清代称为“饽饽”，除夕包水饺，称为“煮饽饽”。饺子成为北方大年的标志食品，一方面因为饺子本身的美味，在生活并不富裕的传统社会，普通人平日难得吃上一顿白面大馅的饺子，所以过年饺子被认为是最好的食品。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饺子具有文化象征意义，饺子是时间变化的象征物，在民俗观念中，新旧年度的时间交替在午夜子时（大致相当于晚上零点前后），在除夕与新年交替之际，全家吃饺子以应“更岁交子”时间，表示辞旧迎新。



◆岁朝图（清蒋廷锡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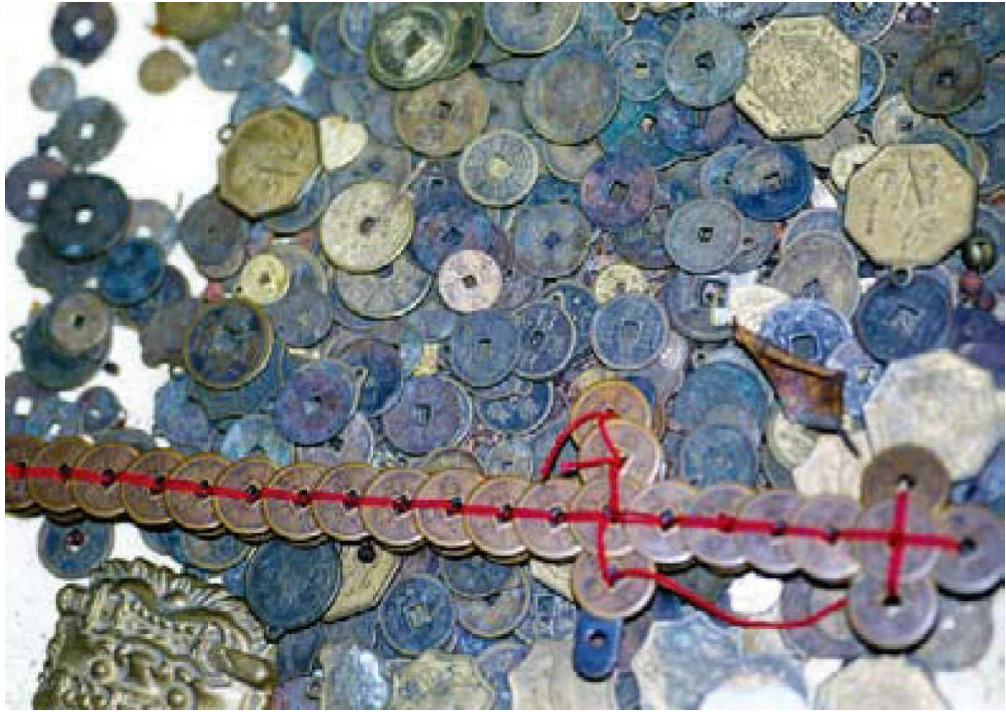
此外，为了添加节日的生活情趣，有的地方在包饺子时，还在饺子馅中加入糖块、花生、枣，甚至银币等物，谁吃到什么馅的饺子，谁就获得好的预兆。吃到糖块则标志着生活甜如蜜；吃到花生就表示长生不老；吃到枣子意为早得子嗣；吃到银币自然预示新年有好的财运。

（二）压岁钱

吃完年夜饭，就发压岁钱。压岁钱是小儿新年最盼望的礼物，有一首诗形象地记述了清代杭州小儿获得压岁钱的欢乐情景：“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枕角自收藏。商量爆竹饧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吴存楷《江乡节物诗》）

压岁钱，年俗节物之一，又称押岁钱、压祟钱、守岁钱等。除夕夜吃完年夜饭，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以祝福晚辈平安度岁。压岁钱起源较早，但真正流行是在明清时期。压岁钱有特制钱与一般通行钱两种。特制的压岁钱是仿制品，它的材料或铜或铁，形状或方或长。宋人王黼《宣和博古图录》记载：钱形长而方，上面龙马并著，俗谓佩此能驱邪镇魅。钱上一般刻有“吉祥如意”、“福禄寿喜”、“长命百岁”等。

明清时期通常用流通的银钱作压岁钱。这种压岁钱，有直接给予晚辈的，有的是在晚辈睡下后，放置其床脚或枕边，意义在于压胜。清代宁波人钱沃臣《压岁钱》诗注中说，俗以五色线穿青钱，排结花样，送给儿童压胜，名为“压岁钱”。“老人分岁浑无事，手数孙曾压岁钱。”北京人除了尊长赐给小儿压岁钱外，还用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给家人压岁。河南小儿通常将压岁钱系于腰间，称为“压腰钱”。湖北小儿则以红绳穿大钱挂于胸襟，称“压岁钱”。在苏州，则以红绳缀百钱作为长辈给小儿的压岁钱。杭州民俗，“儿童度岁，长者与以钱，贯用红，置之卧所，曰压岁钱”。以五色线或红绳串铜钱压岁，它强调的是压岁钱的祝福意义。同时由于这时用流通的制钱给小儿压岁，因此压岁钱给小儿带来了自主消费的愉悦，这种情形恐怕是明清以后才有的新现象，它开启了压岁钱由信仰功能向节日经济功能的转变，这是值得注意的民俗变化动向。



◆压岁钱



◆小孩追讨压岁钱

民国以后，各钱铺年终特别开红纸零票，以备人们当压岁钱支用。当时还流行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寓“长命百岁”之意；给已成年的晚辈

压岁钱，红纸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财源茂盛”、“一本万利”。使用现代纸钞票后，家长们则喜欢选用号码相连的新钞票，预兆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这种用红纸包的压岁钱称为“利市红包”。旧时压岁钱是由家长给自己的子孙，现在亲戚朋友也给孩子压岁钱，而且分量越来越重。

压岁钱原本的意义是表达长辈给晚辈的祝福，它的象征意义远超其实际价值。如果我们比谁给的压岁钱多，并以此作为收受年礼的手段，那它真正是对民俗的背离，甚至还会变成一种人情负担，或者成为不良之人受贿的借口。

（三）守岁

年夜饭后，各家闭门守岁，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边，拉家常，聊未来，谈天说地，一直聊到五更天明，迎来新岁。人们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以通宵不寐的形式守候新年的到来，称为“守岁”。

守岁的习俗在中国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晋朝人周处《风土记》中说到蜀地年俗，年末人家相互馈送年节礼物，称为“馈岁”；相互宴请，称为“别岁”；除夕通宵不眠，称为“守岁”。这是现今看到的关于守岁习俗的最早记载，但这时守岁似乎还是地方性年俗。隋唐之后，守岁成为全国的共同年俗。唐朝有不少咏唱守岁的诗篇。杜甫《杜位宅守岁》诗云：“守岁阿咸家，椒盘已颂花”；唐太宗也有《守岁》诗为证：“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这种欢乐度岁的场面在宋代依然常见。苏轼《守岁》诗云：“儿童强不睡，相守夜喧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除夕》中记载：当时都城开封“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明清以来守岁的习俗依然热闹而有趣味，家人团坐是守岁的主要形式。明代北京人“聚坐食饮”，人们一直坐到天明。清代北京人“高烧银烛，畅饮松醪，坐以达旦，名曰守岁”。守岁的目的是祈求长命。因为是整晚不睡，人们要打起精神强坐，所以在北方俗语中称为“熬年”。民间为了阻止人们除夕睡觉，还形成了一种禁忌，说如果这晚睡觉，第二年身体就不好。守岁是为了强壮身体，延年益寿。在古代守岁还是为父母或老人祈寿的重要方式，因此一般人都坚持守岁。

如今守岁习俗还很普遍，不过人们大都不守到天明，而是在零点新年钟声之后，就上床休息。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将守岁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仪式，是对旧岁的辞别与对新年的守望。守岁民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岁火与灯烛。除夕夜，灯火通宵不灭。即使再节约的人，除夕也要在庭院、屋中燃起岁火，点亮灯烛，为家人守岁祈福。其中大年夜的岁火十分重要。岁火，也叫燎火、旺火、松盆、年火菟，它起源于古代驱邪的需要。民间曾经流传着年兽的说法，说有一个名叫“年”的怪兽，经常在除夕夜出来吃人。人们为防止它的侵袭，就紧关大门，同时因为年兽害怕红色的灯火，所以人们在门口挂上红灯笼，在庭院点燃红红的火焰，这样就保证了家人的安全。这则民间传说有着隐秘的文化含义，它其实是古代先民对时间过渡的一种看法，表达了人们在时间变换中的紧张与不安的感觉。在漆黑的大晦之夜，人们以热闹的灯火驱走黑暗，迎接新年黎明的到来。后来除夕守岁烧火点灯成为除夕守岁的重要景观。民间向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的俗谚。

南朝荆楚地方此时“爆竹、燃草”以避山鬼。隋唐守岁燎火兴旺，成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太平广记》曾记述了隋唐宫廷除夜庭燎的奢华场景，据说唐太宗为了显示大唐的富足安乐，在除夜盛饰宫廷，“设庭燎

于阶下，其明如昼”。

明清时期称守岁烧火为“烧松盆”。明代北京人在三十夜，用松柏枝与柴杂烧于庭院中，以祈福助兴。杭州曾是宋室南迁的都城，它的岁时文化融合南北，明代杭州仍然是著名的游赏地。除夕夜杭州烧松盆的景象非同寻常，架起齐屋高的松柴，举火焚之，“烟焰烛天，烂如霞布”。清代苏州乡农人家除夕夜在门首架松柴，呈井字形，齐屋高，然后举火焚之，以火焰高为吉。传统年节中也有“燃草”迎年的，陕西合阳新年凌晨在院中“焚草爆竹”，以接天神。

河北蔚县年前要在小院中央准备一捆易于燃烧的柴禾、玉米秸秆等，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旺火是在新年爆竹之后点燃，一家人要围着火堆争相烤火。人们认为，如果身体有哪个地方不舒服，烤烤旺火病就会好。

湖北西部长阳的土家人烧火与江南烧松盆的习俗不大相同，他们过年备一个大树茆，称为“火主”，足烧一夜有余，旁边还要加柴炭围烧。湖北东部乡村，除夕家家都将火塘烧得旺旺的，家人一宿围炉夜话。半夜饿了，就在炭火旁烤上糍粑。人们还以糍粑受热隆起的情形，预测家中将添丁或添女。在山西产煤区，人们在年节要点“旺火”，旺火以上等焦炭垒成佛塔状，中间放置引火的木柴。除夕夜大家各自在门前点起旺火，光焰升腾的旺火代表了主人庆祝祈福的心情。

除夕守岁，除了红红的岁火外，还有“燃灯照岁”的习俗，即大年夜遍燃灯烛。在照明设施匮乏的古代，只有重要节日才会灯光满室。明朝人年三十夜，所有房子都点上灯烛，还要专门在床底点灯烛，谓之“照虚耗”，说如此照过之后，来年家中就会财富充实。

3. 迎新年

古代社会民间计时以鸡鸣为准。鸡是古人司晨之钟。俗话说，“鸡鸣将旦”，人们以鸡鸣为新的一天的开始。正月初一的鸡鸣尤有意义，它召唤着新年的到来。当然，随着计时手段的变化，人们已经将新旧时间的界标确定在午夜零点。

（一）“爆竹声中一岁除”

伴随除夕守岁的是爆竹与焰火，喜爱热闹是中国人的天性，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人们尽情地燃放烟花爆竹。

新年爆竹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人们以此驱邪祈福。民俗认为，鞭炮等响声，能驱赶鬼邪，所以有的地方，称为“惊鬼”。中国人爆竹迎年的历史已近两千年。公元6世纪中叶成书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驱逐山怪恶鬼。当时真的是爆竹，方法是将竹筒置于火中烧烤，竹筒受热膨胀，最后爆出声响。

直到唐宋时期仍然采用这种爆竹方式。唐朝人张说在《岳州守岁》诗中说到这种天然爆竹，“桃符堪辟恶，竹爆妙惊眠”。宋人范成大《爆竹行》记述了当时吴地爆竹鸣放的情形，为我们保留了生动的民俗资料：“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八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

宋代除了传统的天然爆竹外，还出现了火药爆竹。据《东京梦华

录》记载皇帝在宝津楼观赏“诸军百戏”时，“忽作一声霹雳，谓之‘爆仗’”。年节中明确记录使用爆仗的是《武林旧事》，在该书“岁除”中说：至于爆仗，有做成果子、人物等不同样式。而宫廷将爆仗做成屏风式样，外面画着钟馗捉鬼的场景，内藏药线，一连有百余响。这是一种花色奇巧的鞭炮，并且将鞭炮驱逐鬼邪的意义也鲜明地体现出来。这种火药爆仗的出现是爆竹的革命性变化，它不仅有霹雳的雷声，而且有硝烟散出。爆仗散出的硝烟有消灭空气中病菌的功效，所以人们在瘟疫发生的时候，经常要燃放爆竹。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明清时期火药爆竹更加流行，人们除了以爆竹驱傩外，还用它来送神、迎神，以及接待拜年客。爆竹的声响增添节日气氛。明朝皇室从腊月二十四开始，直到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白昼在乾清宫前放花炮，遇大风则暂停半日、一日。皇帝升座，花炮伺候，皇帝回宫也放大花炮送归。民间大约放不起这样的花炮，但鞭炮是一定要放的。明代杭州除夕，“爆竹鼓吹之声，远近聒耳”（《熙朝乐事》）。清代北京除夕“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天津南皮除夕日，爆竹驱疫，门前燎火，花炮呼噪，人们齐声叫道：“大户无忧，小户无忧，清平世界，百姓无愁。”（光绪《天津府志》）苏州过年，锣鼓敲动，街巷相闻。送神之时，多放炮仗。炮仗有单响、双响、“一本万利”等。还有一种成百上千的小爆编在一起的长鞭，响声不绝，名为“报旺鞭”。这些鸣鞭的活动，苏州人称为“过年”，是为了答谢神灵一年的保佑，亦称“谢年”。

近代以来，乡村春节鞭炮是年俗必有的项目，鞭炮的多少反映了主人的实力与心情。假如过年没有爆竹声，人们就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等许多城市考虑到安全、卫生等原因，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城里人要放爆竹需要到城郊或农村。禁放爆竹的城市，春节冷冷清清，很多城里人感叹，没有年味。可喜的是2006年前后，上海、北京等城市相继修改了春节禁止燃放鞭炮的规定，以有限禁放（规定时间、地点）代替了此前的完全禁放，给广大市民燃放烟花爆竹庆祝春节的机会。城市乡村春节因为有了鞭炮而热闹非凡。当除夕午夜零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新年钟声敲响时，全国进入鼎沸状态，举国上下烟花飞舞、鞭炮齐鸣，一向矜持的中国人此刻融入狂欢世界。



◆《明宪宗行乐图》中燃放爆竹烟花的场面

（二）祭祀天地、祖先

人们在响彻云霄的鞭炮声中迎来新年，伴随着新年降临的是各色神灵。旧年回天庭汇报的诸神，这时又带着新的使命回到人间。为了迎接新神，各家摆起香案，虔诚祭祀。新年“进酒降神”是汉代就有的传统，民间一直沿袭下来。山东蓬莱“元旦五更设燎，陈盘案，祭赛天地，礼百神，祀先祖。灶前具香灯，谓之‘接灶’。放火炮逐岁”（康熙《蓬莱县志》）。天地、百神、祖先一体礼拜，灶神受到特殊对待。江苏震泽镇迎年接神有固定的程序，“元旦，主人晨起，爆竹。洁衣冠拜天，俗谓之‘接天’；次拜灶，谓之‘接灶’；次拜祠堂及先人画像”。新年人们迎回诸神，诸神的降临意味着年度时间重归人神共处的日常世界。

天地祭祀在古代主要是国家公祭，国家每年有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典礼。在早期社会，王朝统治者是不允许百姓祭祀天地的，所谓“绝地天通”。即使到了明朝，统治者仍然禁止民众祭祀天神，南京官员曾下令：“除岁，庶民毋得焚纸祀天，糜财犯礼。”（《客座赘语》卷三）这恰恰也说明了明朝民间除夕有烧纸祭天的习俗。民间年节祭祀天地的习俗，在清朝以后更为广泛，不仅满族人、蒙古族人要沿袭传统祭祀天神，北方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在年节祭祀祖先与其他神灵的同时，也要祭天地。虽然没有天地的庙宇，但人们俯仰天地间，觉得天地之灵无处不在。为了感谢天地的荫庇，人们在自家庭院供一个天地牌位。

胶东人一般在院内南墙上建一个高约一尺半、宽约一尺的小佛龛，俗称“天地窝子”，里面长年供奉着天地牌位。在山东中部和南部地区，一般在正房外的西窗前垒一座高约三尺、宽约二尺、长约二尺半的平台，谓之“香台子”，以供奉天地牌位。新年期间，家家户户都在院中搭天地棚，祭祀天地神。

河北蔚县人年节上供从天地爷开始，天地爷的牌位放置在院外房门口东面耳窗上，上书“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两旁有对联“净手连心洗，早晚一炉香”，横批是“天地之大”。

晚清北京人年节供天地桌，每到除夕，在庭院布置一长案，供“百分”，“百分”是诸天神圣全图。在神像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称为“全供”。初一凌晨接神时，将神像焚化，点香供奉，直到正月十五而止。

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新年“迎喜神”的风俗，喜神是方位神，人们根据黄历通书推算知晓本年喜神方位。在正月初一凌晨，开门迎年时，人们一定要朝喜神所出的吉利方位叩拜，祭祀喜神，以求一年的吉祥。清代北京除夕接神之后，即为新年。在初次出门时，“必迎喜神而拜之”。在河北张北地区，人们在贺年之后，按喜神方位，将全村的马匹向喜神方向赶去，谓之“迎喜神”。固安县人在正月初一凌晨，牵一头驴向喜神方向走去，也是“迎喜神”。

南方称“迎喜神”为“出天行”或“出天方”，清代湖北长阳人元旦在家拜祭祖先后开门，主人手持香烛，子弟分持庭燎、茶果等。在大门外，面朝喜神方向，设香案、纸烛，四拜，谓之“出天行”。德安（今安陆）人在天快亮时，准备香烛，开门向吉方拜，同时舞动一束燎柴照路，谓之“出方”。现今湖北新年仍然有“出方”的习俗。鹤峰人新年出天行，轻

轻开门，毕恭毕敬，同时诵念：“财门大敞开，元宝滚进来；滚进不滚出，滚满一堂屋。”然后向东方放鞭炮，上供品，燃香纸，跪拜。宜城人是背对堂屋跪拜，南漳人是朝喜鹊窝所在方向跪拜（韩致中《新荆楚岁时记》）。

年节期间祖先与家人同在，祭祀祖先是春节家祭中最重要的祭祀。在以农业为社会生产主业的周朝，对祖先的祭祀更为系统周详。《礼记》对祖先祭祀多有记载，如上面所说的“大饮烝”就是岁末的宗庙祖先祭祀大礼。祭祀百神的蜡祭，在秦汉时期也演变为祭祀祖先的腊祭。腊者，猎也，“田猎取兽，以祭祀先祖也”（《风俗通义》卷八）。腊祭时间在岁末，因此同时有送旧迎新的意义。秦汉时代，人们重视腊月与正月的家庭祖先祭祀。我们在《四民月令》中可见当时年节祭祀祖先的情形。六朝以后元旦例行家庭祖先祭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

唐宋时期，新年重视家人、朋友、君臣、上下的拜贺，对祖先的祭拜有所忽略。但祭祀祖先活动没有停止，唐朝官员有家庙，元日、冬至是两个重要祭祀时间。宋朝守礼的士大夫家也有家祭。

明清以后，由于宗法观念的复兴，祭拜祖先重新成为新年仪式的重要环节。祖先祭祀成为团聚家族成员的重要方式。明清时期富户在堂屋左边单设享室，岁时、伏腊、忌日，必启室祭祀。乡村民众一般在家中的正房或厅堂的北面正中处设神龛以供奉祖先神主牌位。所谓神主牌位，是一种带座可以竖立的长方形小木牌，上面写着祖先的名讳及同家长的关系，如“显考讳某妣某氏孺人之神位”等。寝中的神主只包括高、曾、祖、考四世。有的家庭只在厅堂墙上贴上红纸书写的本门宗亲神位，或者在神龛上供用一大木牌，正中写“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左右两旁分别用小字写上“本门宗祖”、“东厨司命”。

新年是家祭的高潮，人们腊月二十四就接回祖先过年。元旦清晨首先拜天地，其次拜祭祖先，然后才是家人互拜。徽州是中国宗族发达地区，这里的祖先祭祀仪式严整，祭祀必清洁、必诚敬。明代徽州一年有六次祭祀活动，其中新年为首。祭祀有祠堂祭与墓下祭。

明代北京人在除夕开始悬挂先人画像，都用三牲、熟食、糖果等供奉，至初三停止。清代北京的世胄之家，在除夕要致祭宗祠，在家悬挂画像。黄昏之后，合家团坐在祖先神位前度岁。

苏州从除夕夜开始，家家户户悬挂祖先画像，以香烛、茶果、粉丸、糍糕等为祭品，家人穿戴整齐，依次上前叩拜。祖神像悬挂的时间不等，有三日、五日、十日，或挂至上元夜，上元夜隆重祭祀后才收起。

杭州人称祖神像为“神子”，元宵以后就将它收起来，有诗咏其事：“若非除夜何能见，才过元宵不可留。”这种祖神像有三代、五代合绘一图之上的，所以称为“代图”，或“三代图”、“五代图”。

民国以来民间仍然保持春节祭祖的习惯，一般在家里堂屋设有祖先牌位，人们吃团年饭前，先要由家长依次请祖先回家团年，在祖先享用之后，家人再上桌吃饭。山东泰安年祭特别诚敬，除夕，家长率子弟奉香到大门外恭迎祖先，引至祭室，奉茶献果。午夜，设鸡、鱼、肉、肝、肺、蔬菜、米饭、饽饽、黄白米糕、水饺祭祀。家庭男女依次给祖先叩首，然后拜尊长。天明族人来拜年，也要先到家堂桌行礼，然后拜这家的尊长。客人拜家堂，主人要陪礼。

直到当代，祭祀祖先仍为民间新年的传统项目。以河北邯郸为例，邯郸拜祖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家庙，家庙中有各代祖宗牌位，家长率子

孙焚香磕头。二是没有家庙，有祖宗轴子（即画像），挂起祖宗轴子，家人叩拜。三是没有家庙与祖宗画像的，就写出祖宗牌位，家人祭拜。不在家中祭拜的，早起一定要上坟给祖宗拜年（张文涛《邯郸民俗录存》）。总之新年祭拜祖先，必不可少。

湖北英山人是在年前上坟，一般在年夜饭之前，一家人带着三碗供菜（肉、鱼、豆腐等）、三茶盅饭、三杯酒、三双筷子到祖先坟前。东西摆好后，烧纸钱、点香、放鞭炮，人们逐一跪叩，再上酒三巡，然后将酒饭泼在坟前，供菜则可带回家。正月也有上坟给亡故亲人拜年的，这时一般放鞭炮、跪叩就行了。

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祭祀团聚，增强了家族的内聚意识，保证了家族的绵延。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它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单位，中国悠久文明的传承与中国家族社会的绵延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三）贺年与拜年

进入新年之际，人们应节迎新，服饰焕然一新。以鲜洁的服饰迎年是汉代就有的习俗，六朝时的元日“悉正衣冠”也是这一意义。唐朝小儿新年要穿上艳丽的新衣，刘禹锡《元日感怀》描述了这一情景：“燎火委虚烬，儿童炫彩衣。”宋代，“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明朝北京人新年头上戴“闹嚷嚷”，人们用乌金纸做成飞鹅、蝴蝶、蚂蚱之形状，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男女老幼各戴一枝于首中，富贵者有插满头的。这是古代戴胜习俗的沿袭。清代穿新衣拜新年民俗依旧，“鲜衣炫路，飞轿生风”民国及至今天人们新年皆穿新衣，元旦五更起，“无贫富老幼皆更新衣”（民国《新乡县志》）。北方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在民俗中，新洁衣饰不仅是年节的美饰，同时也有神性意义。河北蔚县陈家洼乡南许家营村人认为：新衣服要在年三十上供之前换，这样干干净净的才可以给神上供，才可以敬神，神仙看着也觉得干净。而且，只有这样，来年才不会穿破的衣服。衣服上还要带点儿红布条或者红线，表示一年红、身体红。新的衣饰是为了祈福除灾。通过旧年阈限之后，人们获得新生。穿上新衣，戴上新帽，象征人们进入新的生命旅程。这种身体的新打扮与门户的新装饰，都体现了中国人重视新年，具有强烈的时间更新意识。

酒是新年仪式中的重要饮品，是祭神的佳酿。祭神之后，朝野都要饮酒庆贺新年，因此新年之酒也称“春酒”，《诗经·豳风·七月》云：“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过年还有特制的保健辟邪的药酒，汉代称为椒柏酒，用椒实与柏叶浸制而成。唐宋人称这种药酒为屠苏酒，屠苏酒的得名有一个传说。俗传屠苏是一个草庵的名字，有人居草庵中，他每年除夜送给附近居民一个帖药，让人们用布囊浸于井中，元日取井水置酒器中供家人饮用，“不病瘟疫”。后人知道这药酒之方，但不知此人姓名，故称为“屠苏酒”。也有人解释说“屠苏”二字为“屠绝鬼邪，苏醒人魂”之意。无论如何，新年的春酒是祛邪祈福之酒，如南朝诗人庾信所咏：“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

古代过年饮酒，有特别的方式，“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荆楚岁时记》）。就是饮酒从小的开始，说小孩又该长一岁了，值得庆贺。老年人失岁，所以不贺。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一诗中“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两句，咏唱的就是这一习俗。我们看小孩过年欢天喜地，是有它的道理的。新年饮酒的仪式意义十分明显。明清以来，新年饮酒成为社交与生活娱乐方式，民国《金陵岁时记》中说：“新年邀集宾朋燕饮，称为饮

春酒，以正月半前为盛。”在太平天国之后，人们过年多喝烧酒。光绪末叶，饮食逐渐奢华，金陵人多喝绍酒、汾酒。现在人们过年，酒仍然是不可少的饮品，不过大多喝红色的葡萄酒，以增添节日气氛。

清晨，人们迎来新年，接着是贺年、拜年。顺序是先家内，后家外。明代，北京元旦拜年盛行朝野上下，“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陆容《菽园杂记》卷五）。明代京城拜年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见面跪拜。如果人们在路上见到亲友要下车，在路中叩头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长率家人奴仆，拜天地、祖先，给上辈祝寿，然后互拜。并用三牲熟食祭祀，纸钱供于祖先牌位前。然后打扮出门给亲戚朋友拜年。士庶人等向亲友拜年，多是实心实意。

另一种拜年是一种虚套的礼仪形式，明朝中期京师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间的往来，讲求礼仪形式。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均望门投帖；有的不下马，或不至其门，只令人送门帖（《菽园杂记》卷五）。门帖，类似今天的贺年片，据说宋代就开始送节日贺卡。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代杭州特别重视元旦，“今海内士庶咸重岁首，而庆拜往还，举酒相祝，惟吾杭最盛。”当时有谚曰：“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可见民间年节时老少欢娱的情景。有一首小词道尽了明代杭州民间元旦的风俗：“接得灶神天未晓，爆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清朝中期，北京人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朝。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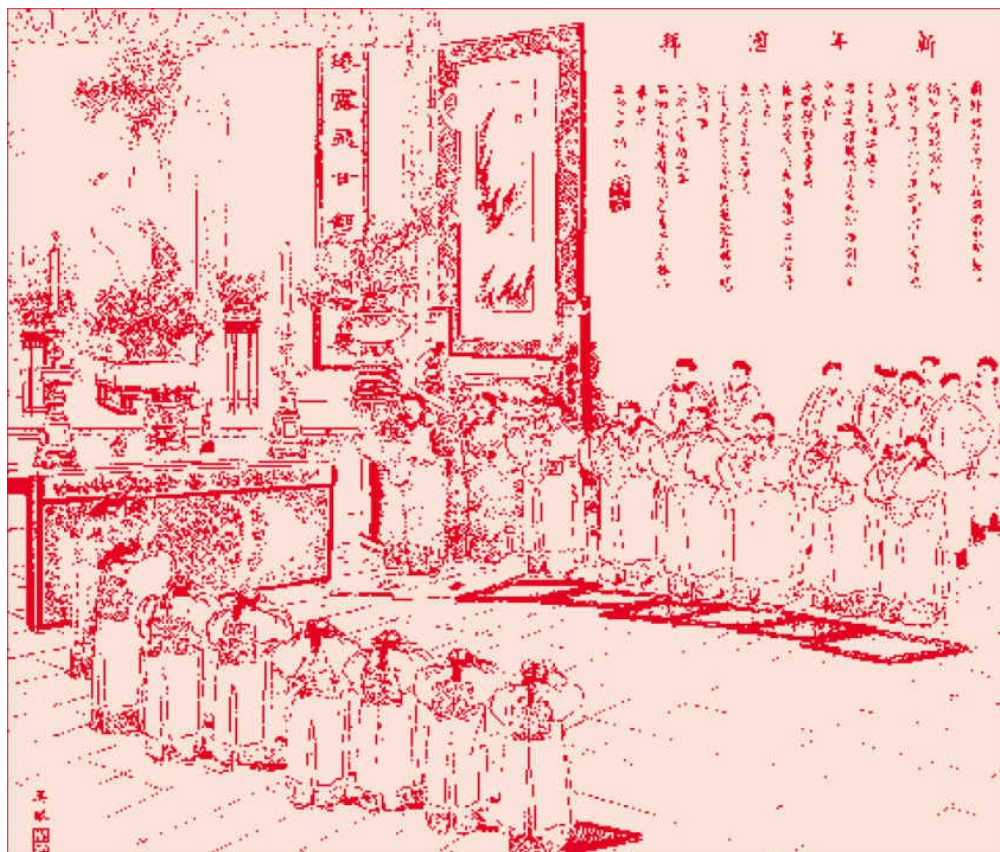
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具柬贺节”，有登门揖拜，即使路上亲友相遇，也要下车长揖，口颂“新禧纳福”。晚清“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贺”。然后，百官走访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员往来交错，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燕京岁时记》）。



◆春节拜年（年画）

清代苏州贺年、拜年习俗，《清嘉录》记载甚详。放过开门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辈份给家长拜年之后，由长者率家人出门拜谒邻居亲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长前往庆贺，谓之拜年。就是终年没有往来的，这时也互相往拜于门。人家在门首设一记事簿，专记拜年客的姓名，这种记事本称为“门簿”。当时还有“飞帖”拜年的习俗，家长大多并不亲自登门拜年，而是让仆人将拜年红帖送到亲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样遣仆人送帖。这种往来送帖拜年的习俗，称为“飞帖”。人们为了接帖方便，新年时就在门上粘一个红纸袋，写上“接福”二字，或者称为“代僮”。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简，康熙中则换成红单，只书某人拜贺。拜年的时间一般不得过初十，过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知礼数。

旧时拜年强调家族关系，拜年的过程就是家族关系的强化过程。江西东乡横路何氏宗族每年正月初一都要进行团拜，团拜并不仅仅限于一个族院，而是在整个横路何氏宗族中进行。团拜按照宗谱中记录的长幼伦理秩序进行，即晚辈向长辈拜年，小房向大房拜年。辈分顺序不能改变。



◆新年团拜

直到今天，乡村、城市仍然保持传统拜年庆贺之俗，在山东、河北地方乡村仍有跪拜的习惯。

（四）接财神

新年来到，也就意味着新财神的降临，人们都非常重视财神。财神有许多化身，从民间信仰看，有文财神、武财神、五路财神、青龙财神

等等。

我们先看文财神。在年画与庙宇泥塑中，我们见到的文财神的形象是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蹬元宝，面目严肃，脸庞清癯。据说他是商朝的比干。比干是位忠臣，他的心被商纣王所挖，但因吃了姜子牙送他的灵丹妙药，存活人间。他在人间广散财宝，因为没了心，也就无偏无向，办事公道，所以为人们所敬重。当时在比干手下做买卖的，也都是公平交易，互不坑骗。因此，人们把比干这童叟无欺的正派君子当作财神。在《封神演义》里，比干被封为北斗七星之一，后来幻形人世，成为文财神。另一位文财神是范蠡。范蠡是经营的高手，三次聚财，三次散财，他致富的天才与重义的品质，赢得了人们的崇拜，人们因此奉其为财神。

再看武财神。武神赵公元帅可谓家喻户晓。赵公元帅，名朗，字公明，是一位道教人物。传说他是陕西终南山人氏，秦朝时避世山中，虔诚修炼。以后汉代的张天师收他为徒，命他骑黑虎守护丹炉，天帝封他为“正一玄坛赵元帅”。《封神演义》中说姜子牙封赵公明为“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招财使者、利市仙官都归他管，这就是他被奉为财神的因由。民间所供赵公明财神像皆黑面浓须，顶盔披甲，手持钢鞭，胯下一只黑虎，在其周围，常画有招财童子、聚宝盆、大元宝和珍珠珊瑚之类，以示财源茂盛。

另一位武财神是关公。关公，名羽，字云长，三国时人，因其忠义勇武被历代帝王加封各种封号，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关圣帝”。民间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将关羽奉为忠义的化身，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一些工商组织，将关公视作行业的保护神与财神。我们在当今的公司办公楼与酒楼饭店常常见到神采奕奕的关公神像。



◆文武财神（年画）

五路财神信仰，主要在南方流传。所谓五路，就指东西南北中五路。五路神也是行神，即出门五路皆为发财之路。财不自来，必奔走四方而得之。商业贸易依靠交通往来，交通的便利安全，有赖于道路之神即行神的护佑。传统的行神崇拜，在商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演变为财神崇拜。

在山东和浙江地区盛行以青龙为财神的风俗。龙是鳞虫之长，在民间，它也是最为尊贵的吉祥物，并被神化为龙眼识宝、龙行有雨等。民间青龙财神年画中多为青龙飞绕，青龙财神的两侧是和合二仙，前面是聚宝盆，青龙口中正吞吐着珠宝。



◆关公（年画）

春节期间人们相见，开口就是“恭喜发财”，“发财”成为岁首时节最活跃的词汇，“迎财神”、“接财神”等构成节日的重要祭祀内容。迎财神的时间一般在正月初一至初五。

正月初一迎财神是与其他新年神灵一起的，春节凌晨开启门户，称为“开财门”。湖北仙桃人在初一开门向吉方祭拜时，要大声喊道：“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

在河南一些地区，除夕晚上在院子里树一大竹上挂铜钱、铃、枣、

胡桃等物件，称为“摇钱树”，男女都可以来摇。传说除夕夜财神从空中飞过，如果正好在财神飞过时报树，那就得到发财的吉兆。各地还有乞丐新年送财神的习俗。

在四川南部，大年初一有“扫财神”的仪式。有人头戴财神爷的帽子，脸上蒙着财神爷的假面具，身穿一件戏袍，手拿一把新扫帚，另有一人敲着小锣，他们来到人家门口。财神先向门里的主人作揖，再用扫帚在门口象征性地扫进扫出，左扫右扫。那个敲锣的人便一边打锣，一边念着：“一扫新年如意，二扫清吉平安，三扫人丁兴旺，四扫百病消除，金银财宝扫进去，是非口舌扫出来，左扫左发财，右扫右发财，扫也发财，不扫也发财。”然后主人便赏给“扫财神”的人喜钱。

北京人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家庭还是商号“咸祭财神”，都要吃馄饨，称为吃“元宝”，远近鞭炮声昼夜不息，甚于除夕。财神祭品多用活鲤鱼和羊肉，取“鱼”、“羊”之和乃为“鲜”意，以表示新财神降临，今年发新财。祭祀后的鲤鱼要到河中放生。北京广安门外有五显财神庙，旧时初二财神庙开庙，人们都到庙里祭财神。财神庙香火极旺盛，庙中准备了许多纸质元宝，香客出若干银钱就可“借”一二对元宝回家，供在家里的神龛上，说是向财神爷借到了元宝，今年准会大发利市。庙旁的一些元宝摊子，有的只做一天生意，即可维持一家人大半年的生活。

江南地方祭财神一般在正月初五。南京初五为财神日，清晨人们摆供设祭，焚香接神。在苏州，无论贫富贵贱初五都要祭祀路头神，说初五是财神五路的诞日。初五这天人们争先早起，敲起金锣，燃响鞭炮，摆上牺牲供品，迎接路头神。谁先接神，谁就得到利市。蔡云《吴歠》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路头神来源于古代行神，将行神奉作财神大约是清朝江南人

的创造。江南城市商业发达，商品货物的往来流通无不倚重交通，物畅其流，也就财运亨通，所以传统的道路之神，也就变化为主管财运的财神。“五路者，为五祀中之行神，东西南北中耳。求财者祀之，取无往不利也。”财神祭祀完毕，然后开市贸易。

上海，初五接财神，有人挑担上街卖鲜鲤鱼，称为“送元宝鱼”，晚上喧闹喝酒，名曰“财神酒”。有的地方在初四晚上就设祭，接路头财神。祭祀时，酬神的酒要倒得满满的，叫做“满满十分财”；在初五早上要吃面和糕，称之为“路头面”或“路头糕”。商店老板还要杀鸡摆酒请伙计吃饭，实际上是借此机会辞退自己不满意的伙计。届时端上来的一盆鸡的鸡头朝着谁，即表示该人被辞退了。而伙计们则把这一天称作“铺盖生日”。留下的就有生计，辞退只好卷铺盖走路。

4. 新春礼俗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它一般在新年之初，是正月里的一个重要节日。

周天子在立春之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春。汉朝继承周制，在立春日，皇帝率大臣到东郊迎接春气，祭祀青帝、勾芒。这天，人们穿青色的衣服，唱《青阳》之歌，舞《云翘》之舞。六朝时期，人们在立春日，剪彩为燕，戴在头上，作为迎春的彩饰。还要在门上贴“宜春”二字。唐人更以立春剪彩为时尚，诗人李远的《剪彩》诗云：“剪彩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衔绶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立春剪彩中蕴含着对情人的深深祝福。

（一）鞭春

宋朝开始有鞭春习俗。《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北宋开封府，在立春前一天，“进春牛入禁中鞭春”。



◆过春节（年画）

明代北京立春时节要举行盛大的迎春、鞭春仪式，仪式由官府主持。在东直门外设有春场，场内有春亭。每年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帜前导，次田家乐，次芒神亭，次春牛台，次县正佐、耆老、学师儒。府衙上下皆骑马，只有县丞府尹坐轿，官员一律着红色衣服，簪花迎春，将春牛由春场迎入府内。这天，塑小春牛芒神，由京兆生送入朝中，依次进皇上春、中宫春、皇子春。然后，百官朝贺。立春当日，府县官吏，各穿官服，礼勾芒神，用彩色的鞭子鞭打春牛三次，以示劝农之意。立春日，北京人无论贵贱都嚼萝卜，称为“咬春”。民间互相请客宴会。

清代立春日，有“进春”仪式。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京师除

在各衙门鞭春外，还有带着彩绘制作的芒神、土牛，在吹吹打打的仪式中，由京兆尹率着国学生恭送大内朝廷。

苏州、扬州在明代一如杭州，以优伶官妓为行春的仪仗队伍，清朝初年仍然如此。扬州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人，春姐二人、春吏一人、皂隶二人、春官一人。立春日，打春官，给春官二十七文报酬，另赏春官通书十本。康熙年间，裁减乐户，没有官妓后，人们用花鼓戏中的角色代替，在扬州花鼓中，女性人物角色均由男性扮演，所以扬州俗语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灯。”（《扬州画舫录》卷九）清中期后，苏州等地也由以前的官妓改为市井乞儿充任社火表演者。立春前一天，郡守率僚属迎春于东郊娄门外的柳仙堂。观者如市，男女争着用手摸春牛，以求新年好运气。民谚云：“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立春日，太守在府堂举行鞭春仪式，用鞭子鞭碎土牛，谓之“打春”。立春日在苏州称为“春朝”，过节气氛与冬至差不多，人们用米粉做丸子，祭祀神灵、供奉祖先，并互相拜贺，名为“拜春”。



◆打春牛

民国之前，各地仍有“打春牛”的习俗。人们用泥土做成春牛，涂上

五彩，还要做一个芒神。在立春这天，由县令在衙门内主持鞭春仪式。县令用彩鞭鞭碎春牛，众人争抢土块带回家，说是今年就会有好收成。民间在立春前后要张贴春牛图。春牛图是年画的一种，画中有一儿童装扮的芒神，手持柳条，或立牛侧，或随牛后，或骑牛背。陕西的春牛图有“天下大吉”、“天下太平”的字样。

（二）春饼

立春还有特定的饮食，春饼是典型的一种。六朝时即有春饼，春饼是一种薄面饼，人们用它裹生菜食用，春饼与生菜等在古代称春盘。杜甫在《立春》诗中曾写下“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的佳句，至今伴随着春饼令人回味。明代北京人立春互相请客宴会，吃春饼和菜。用棉花塞耳，说这样新年耳朵的听力好。清人孙国敕《燕都游览志》记载：“立春日，于午门赐百官春饼。”苏州人春前一月就在市场上卖春饼，商人标示所卖饼子为“应时春饼”。

春卷是与春饼类似的近代立春食品，春卷将菜馅裹入薄面皮中，然后油炸食用。春卷具有皮薄、色黄、香脆、质嫩、味鲜的特点。萝卜也是立春的应节食品，明代北京人无论贵贱都嚼萝卜，称为“咬春”。清代北京人新春日献辛盘，即使是一般百姓，也要杀鸡割肉，做面饼，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生吃水红萝卜，名为“咬春”。现代都市、乡村大都传承着新年吃春卷的节日食俗，其中蕴含的迎春之意不言自明。

5. 正月十五“闹元宵”

如果说大年是一台全民参与的民俗大戏，那么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是

这台大戏的压轴节目。元宵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故称“元夕”、“元夜”。道教称元宵节为上元节，还将它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元节”，上元节是天官赐福的节日。



◆正月十五闹元宵

元宵节典型的节俗是灯会，因此元宵又被称为“灯节”。元宵节起源说法不一，一般来说它有两个源头。一是中国本土正月上旬的祭祀传统，汉武帝在正月上辛日到甘泉寺燃灯祭祀太一神，灯火彻夜不熄。这种习俗后来移到正月十五。另外一个源头跟佛教有关，西域摩揭陀国每年十二月底（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十五）要在城内做燃灯法会，纪念佛祖。随着汉明帝迎经白马寺，佛教合法进入中土，正月十五燃灯表佛的习俗也逐渐为人们所习用。灯彩有很好的视觉效果，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来说，它与春节的爆竹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宵灯会的兴盛从隋唐开始，历代相沿。隋炀帝杨广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年元宵他都要在都城洛阳举行盛大的灯会，招待外国使者，以夸耀中国的富庶。唐朝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朝代，元宵节张灯风气更盛。八十尺高的百枝灯树，竖立高山之上，百里都能见到。二十丈幅的灯

轮，“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唐朝皇帝为了举国同乐，将以前正月十五一夜的灯会，延长到三夜，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官家放假三日。为了人们通宵观灯游赏，节日期间取消平时的宵禁，即所谓“金吾不禁”。唐初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接着苏味道咏赞了唐代元宵节的灯火盛况与游乐场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宵赏灯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帝王为了粉饰太平，“与民同乐”，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灯，“山楼上下，灯烛有数十万盏”（《东京梦华录》卷六）。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延长到五夜。新

增的十七、十八两夜，最初限于京师开封府，据说是展出由两浙钱王进献给皇上的浙灯。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所以民间流传钱王买了两夜灯的说法。

宋朝关于元宵灯会有两则逸事。一则是州官放火的故事，据《老学庵笔记》记载：田登在做州官时，忌讳说与自己名字同音的“灯”字，元宵节放灯是官民俗习，他也躲不过，但在其辖区内贴出的告示是：“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后来人们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来批评官员的霸道与专横。另一则故事是批评官员以娱乐粉饰政治的不良做法。蔡君谟任福州太守时，在上元节下令，每家张灯七盏。当时有一位读书人，做了一盏丈余长的大灯，灯上题诗一首，“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太守十分羞愧，只好下令罢灯。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节依然延续，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从正月十一开始，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



◆庆赏元宵（年画）

北方以京城为代表，明朝永乐年间灯会持续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物齐凑，热闹非凡。明代灯市十六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妇女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

明代南方元宵灯会同样热闹，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称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灯，至十三日晚，则家家灯火，光照如同白昼。“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福建元宵灯会如同京师的十夜灯会。富人家庭的妇女乘轿出行，贫者步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

浙江杭州亦是明代元宵灯会繁盛之地，张瀚说除京师外，“若民俗最盛于杭”。杭州正月十五前后张灯五夜，在元宵前，灯市即开，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元宵节时，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猜灯。或祭赛神庙，则有社火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

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

放烟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灯会的内容之一。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按例放烟火盒子，烟火盒子悬在大架上，每盒三层：第一层写“天下太平”四大字；第二层鸽雀群飞，取放生之意；第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竹叶亭杂记》卷一）。北京烟花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燃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天津上元日，号为灯节，“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遍地歌舞”。山西民间同样“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相宴饮”，名之为“闹元宵”。

清代，南方元宵灯会依然兴盛，苏州灯在宋代就著称于世，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武林旧事》卷二）。清代苏州灯市货郎出售的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品类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卖诸灯未改古制，而乡镇别邑，又皆买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后，喧盛尤昔。”苏州元宵用松枝竹叶在通衢扎棚，白天悬彩，晚上燃灯，阖门之内，“灯彩遍张，不见天日”。除街道张灯结彩外，家户店铺、神祠会馆都燃灯庆祝，平民人家在中堂点燃两根大蜡烛，安排宴席，互相观赏。当时“华灯万盏，谓之灯宴”。游人以看灯为名，结伴闲游，通宵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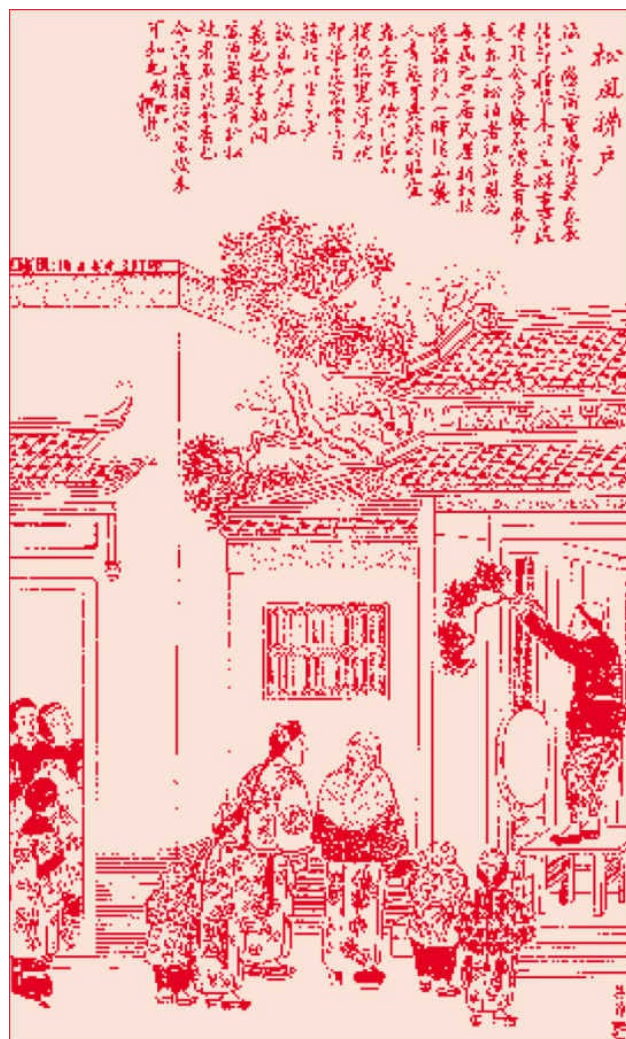
◆元宵大香烛

小戏表演是元宵节民俗项目，北方乡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乡村演花鼓戏，唱采茶调。清代湖北黄安正月十五前后舞烛龙，俗以此“压灾驱疫”。还有采茶灯，以十二个童男扮女装，各人带灯一具，称为“茶娘”，唱采茶调，每月一曲，每曲以“采茶”二字起兴。城乡妇女十五结伴同游，称为“荡元宵”。

明清时期，正月新年里各地有许多的庙会。庙会是岁时节日的补充形态，它与城市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清时代北京庙会多，有大钟寺庙会、白云观庙会、厂甸庙会等，热闹非凡。江南苏州新年逛庙会成为习惯，“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其中苏州城中的玄妙观，是游人最集中的地方。观左右门名“吉祥”、“如意”，人们穿行二门，以取新年吉兆。

明清元宵时期南方民间还有“照田蚕”的习俗。农家在正月十五晚在园圃、田间燃烧火炬，以驱除虫害，乞求丰收，称为“照田蚕”或“照地蚕”。

拜紫姑是明清时期元宵夜的一项女性民俗活动。紫姑是六朝时出现的民俗神，民间称为“姑娘”、“七姑”、“戚姑”、“厕姑”、“坑三姑”等。明朝北京在正月十五前后夜，妇女扎一草人，穿上衣裙，号称姑娘，有两个女童扶掖，以马粪祭祀，打鼓，唱神歌，祈祷三遍，姑娘神就会跃动，以草人立拜，还是倒地不起，确定休咎。这样的活动一定不能有男子出现（《帝京景物略》卷二）。明代江南元宵节也要拜姑娘神，杭州妇女人家在元宵节召帚姑、针姑、苇姑、筲箕姑，以卜问一岁吉凶。清代苏州“望夕迎紫姑，俗称接坑三姑娘，问终岁之休咎”（《清嘉录》卷一）。苏州接紫姑，是用以红布缠绕斗筲、列案祷请、银簪划灰的方式进行。人们问一年的农桑、疾病、牲口情况。



◆松风拂户：江南民间有元日在门上悬挂松枝的习俗



◆卖元宵

吃元宵。元宵是一种节令食品，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为时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后，就开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细粉制成，圆形，内包核桃仁、白糖为馅，大如核桃，江南称为“汤团”。清代苏州人称为“圆子”，杭州人称为“上灯圆子”。在祭祀祖先之后，家人老乡一起享用圆子，取其团圆的意义。

元宵的声响与色彩共同烘托着元宵节的气氛。元宵的月亮悄然俯视着人间的灯火。元宵的热闹吸引着乡村、城市的居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看戏、观灯、猜灯谜，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有的人文景观。正月元宵

是一年中唯一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秩序的约束，享受着本性的感官愉悦。人们祈求婚姻美满、子嗣绵延、身体康健与年岁丰收。有人说元宵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似乎有几分道理。

现在，城市公共生活需要有元宵节这样的公众节日，元宵节可以有集体性的观灯赏月与民俗行游活动，适合进行广场式的社区联欢聚会。通过共享的节庆习俗，增强公众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意识与责任，以孕育培植社区共享的精神传统。

四、文艺作品中的春节



节是中华第一大节，古今中外多少中华子民心系春节，团圆吉祥是春节恒久的主题。人们享受春节，歌咏春节，春节团聚、朝会、拜年、饮酒、游赏等节俗都成为历代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古诗、词曲与小说等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春节的另一种魅力。

1. 古代诗词中的春节

春节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确立，当时号为正日、正旦，魏晋南北朝时期春节名为元正、元日。从汉朝开始，岁首朝廷举行大朝会，君臣相贺。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写下了著名的《元会》诗（见第一章引），堪称春节诗之滥觞。

岁首元会不仅是君臣的聚会欢庆，同时也是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机会。晋朝的傅玄《庭燎》诗，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元正始朝享，万国执圭璋。

枝灯若火树，庭燎继天光。

大意为：在元正之日，万国来朝，宫灯若火树在年夜中闪耀，大年夜用来照明的庭燎熊熊燃烧，直到天明。

古时帝王为了显示皇恩的浩荡，常在正旦朝会上赐酒群臣，北周大臣庾信有《正旦蒙赵王赉酒》一诗，记其事：

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
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
流星向椀落，浮蚁对春开。
成都已救火，蜀使几时回。

正旦所饮酒是驱除邪恶的酒，是乞求长命的酒。所以这酒是特制的保健酒，有柏叶酒、椒花酒等，这酒也是迎春的春酒。诗的最后两句用的是一个典故，晋葛洪《神仙传》记载：蜀人栾巴有仙术，他在正旦大朝会上，突然向西南方喷酒。管纠察的朝臣控告栾巴不守朝会礼节，栾巴说：家乡失火了，我用酒扑灭它。不久，果然有蜀郡人来报，成都元日大火，忽然东北大雨来灭火，雨中还有酒气。庾信原为南朝梁人，出使北朝被扣为官，他思念家乡，故用此典。佳节怀人思亲，自古皆然。

当然，年节最快乐的是儿童，湖北英山民间有俗谚云：“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小孩子最盼望年节的到来，唐朝人亦然。如李约的《岁日感怀》诗云：

曙气变东风，蟾壶夜漏穷。
新春几人老，旧历四时空。
身贱悲添岁，家贫喜过冬。
称觴惟有感，欢庆在儿童。

在新年子夜之后，曙光初现的时刻，不仅旧岁计时蟾壶中的水已经漏完，需要更换新的蟾壶，就连凌晨的空气也变得温暖起来，新春已然降临。虽然年月催人老，但好在度过了难熬的冬季，值得举杯庆贺。那些无忧无虑、欢呼雀跃的少年真令人艳羡。

歌咏新岁诗歌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

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伴随着新年到来的是脆响的爆竹与温暖的春风。为了迎接新年，在天色朦胧的早上，千家万户都挂出了新的桃符，以祈求新年家人平安吉祥。王安石在旧岁与新年交替时刻，以诗的语言抒发了他革故鼎新的政治豪情，新年在他的心目中就不只是时间的代换，而是充满希望、充满生机勃勃的新世界。

新年万象更新，人们为应佳节，换上新洁的衣饰。元朝著名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有《题耕织图》诗，其中就有云：

田家重元日，置酒会邻里。
小大易新衣，相成未明时。



◆竹报平安

除了古代诗歌中有对新年的歌咏外，在词曲中也有许多咏赞新年的作品，因为词曲婉转，有时更能描摹新春时节人们的情感与心态。兹择两首，其一是宋代大文学家辛弃疾的《蝶恋花》“元日”：

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往日不堪重记省，
为花常把新春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
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

新岁与新春同步，过年既是迎春。饮过新年的椒酒，头上佩戴迎春的彩胜，词人念叨着春花的节候，期望春天的脚步轻快如常。

其二是宋代著名词人姜夔的《鹧鸪天》“丁巳元日”：

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

端又一春。 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

姜夔笔下的新年犹如一幅风俗画，绿色的柏叶酒与红色的椒酒置于几案之上，隔着屋外的竹篱见到提着灯笼凌晨出门的拜年人。伴随着晨钟响起的是新春的降临，对于词人来说，又老了一岁。词人以清闲自居，不愿开门应酬。只要有梅花相伴，娇儿在身边嬉耍足矣。家庭的温情与人伦的快乐，在这首小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元宵节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诗词中对元宵欢会的描述甚多，现摘录数首，供读者欣赏。

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隋炀帝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
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隋炀帝是一位很有文采的帝王，他曾经自夸，可以凭自己的文采考上皇帝。这首元夕诗作就显示了他不俗的诗才。元宵节，隋炀帝在洛阳铺张灯饰，火树银花，极尽侈靡。

正月十五夜

〔唐〕苏味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秣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正月十五夜

〔唐〕张祜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唐代延续隋朝欢度元宵的风俗，正月十五晚上取消宵禁，让官员市民自由观赏明月、灯火，通宵游乐。明月、星光、灯树、行歌、舞蹈、游人编织了盛世良宵的美景。

又如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元宵良夜，是情人相会的日子，有多少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元宵夜中。我们看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火阑珊处。

宋代都市的元宵奢华浪漫，明月繁星、宝马香车、歌舞百戏、美人笑语，盈街满路。可借元宵出来幽会的心上人在哪里？忽然回首，原来她在灯火阑珊的僻静处。



2. 小说中的春节

古代小说长于描摹世情，春节这样盛大的节日，自然亦为小说家所关注，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往往借助年节机会呈现出来。

《醒世姻缘传》成书于17世纪，虽然作者描写的是明朝中期的家庭生活，实际却是清朝中叶后现实生活的反映。据说小说反映的地域范围是山东淄博一带，书中有许多淄博的方言土语。在第二回中写到了年节：

（晁大舍）因年节近了，在家打点浇蜡烛，炸果子，杀猪，央人写对联，买门神纸马，请香，送年礼，看着人榨酒，打扫家庙，树天灯杆，彩画桃符，谢杨古月：也就没得功夫出门。算计一发等到元旦出去拜节，就兼了谢客。正是日短夜长的时候，不觉到了除夕，忙乱到三更天气。正是：桃符初换旧，爆竹又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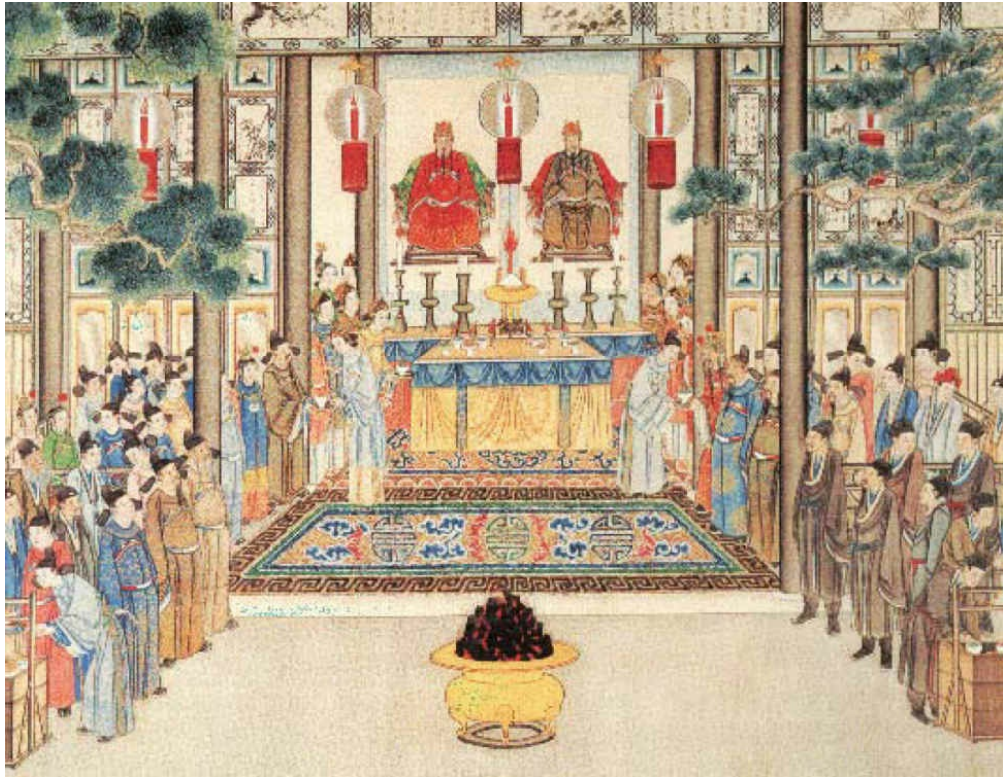
这段文字虽不多，但我们看到了当时普通人家迎接新年的景象。一是备办祭祀用品，打扫家庙，准备新年迎家神。供神用的香、蜡烛，或购买，或自制；二是准备年节食品，要炸果子、杀年猪、榨年酒；三是装饰庭院烘托新年气氛，贴对联、门神，重新彩画了桃符，值得注意的是树天灯杆，这似乎是受清朝满人习俗影响的年俗；四是元旦要拜节。拜年是传统大年的必备项目，并且要穿上新衣服，带上拜年帖。在第三回中说：“到了除夕，打叠出几套新衣，叫书办预备拜帖。”五更四点，晁大舍起床更衣，“天地灶前烧了纸，家庙里磕了头，天也就东方发亮了”，然后出门拜年。

《红楼梦》同样成书于清中期，它以贾府大家族为描写对象。书中第五十三回对京城年节习俗有着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大家族过年隆重而奢华，腊月到了，王夫人与凤姐这两位重要人物主持操办“年事”。“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挂遗真影像。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皇帝还给皇亲国戚春祭的恩赏，对于家族来说是一种荣光。正如贾珍所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又是沾恩锡福的。除咱们这样一二家外，那些穷官儿家，若不是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皇上的恩赐是年节的华饰，最实在的还是庄园的年供，黑山村的乌庄头照例送来年供。乌庄头呈上红禀帖上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据供单，乌送来的都是山珍海味、腊鱼腊肉、鲜鸡活鸭、精米干菜等，共折银二千五百两。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接着是家庙祭祀，次日贾母领着子孙到贾氏宗祠祭奠，仪式肃穆庄严，“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影。”“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隙空地。鸦雀无闻，只听得铿锵叮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贾府年节祭祀祖先的阵势令人惊叹。

接着贾府的子弟要来拜贾母：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贾敬贾赦等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价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一面说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两旁设下交椅，然后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妇、小厮、丫环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进内间更衣，众人方各散出。

这里我们看到清代中期京城大年三十年夜饭的情景，年夜饭前，晚辈、卑者要向尊长拜年庆贺，尊长此时得赏赐拜年者压岁钱及年节礼物，这是表现家人和睦的时机，也是享受亲情的时刻。“一夜人声嘈杂，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

小说中元宵节会描写最多，大约元宵是一个以公共空间活动为主的

节日，期间发生的故事自然曲折丰富。

《水浒传》是长篇的话本小说，在宋元以来说书人的底本基础上写成，书中描写的虽然不能肯定为宋朝的事情，但确有不少明以前的描写。书中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说到宋江流浪被花荣收留，腊尽春回，元宵节近。一日，宋江无事到清风寨闲逛。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准备庆赏元宵，科敛钱物，去土地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彩悬花，张挂五七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逞应诸般社火。家家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

元宵当天宋江一行来到土地大王庙前：

看那小鳌山时，怎见的好灯？但见：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梅灯，晃一片琉璃；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蛾斗彩，双双随绣带香球；雪柳争辉，缕缕拂华幡翠幕。村歌社鼓，花灯影里竞喧阗；织女蚕奴，画烛光中同赏玩。虽无佳丽风流曲，尽贺丰登大有年。

乡镇上的元宵虽不能与京师相比，但也繁华热闹，人们以社火表演与花灯祈请新年农事的丰收。

《金瓶梅》为四大奇书之一，该书成书于明代中后期，是反映明代社会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多次描写到元宵盛况。其中第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赏元宵楼上醉花灯”中对当时烟花燃放场景进

行了详细描写：

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但见：

一丈五高花桩，四周下山棚热闹。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着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当中一个西瓜炮迸开，四下里人物皆着，簪剥剥万个轰雷皆燎彻。采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满天星；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霸王鞭，到处响亮；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的旋转得好看；银蛾金弹，施逞巧妙难移。八仙捧寿，各显中通；七圣降妖，通身是火。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霞；紧吐莲，慢吐莲，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春。楼台殿阁，顷刻不见巍峨之势；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闹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烟齐明；鲍老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

这段元宵烟火描述，让我们领略到此时烟花制造与燃放技术之妙。

另外，《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中俱有关于元宵盛况的记述，限于篇幅，就不一一道来了。

五、春节的现代意义



节，俗称大年，它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节日，原名为元日、元旦、正日、岁朝、岁首。它作为岁首的时间位置，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确立，而更名为春节却不到百年。如今，北京人的春节非同寻常，春节的鞭炮在被禁止了十多年之后，重新回归民俗生活之中。丙戌年新春的子夜，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是飞扬的礼花与清脆的爆竹声。有人说：这是民俗的胜利。我要说：它是理性社会的胜利。从公共管理部门对鞭炮的禁放到限放，我们看到了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

2005年6月，中宣部与精神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等联合发文，要求通过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中央与政府“以民为本”的重要举措，它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节日不是普通的假日，节日有着特定的民俗文化内涵，它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资源。春节作为民族第一大节，它的社会意义尤为重大。

1. 春节是聚合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

春节（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大节确立于汉朝。汉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此后中国两千多年沿袭了这一历法体制。正月新年成为举国上下共享的盛大节日，如史书所说：“官有朝贺，私有祭享。”朝贺与祭享的各种仪式活

动，增强与更新着各种家庭、社会关系。传统的春节，作为岁时节日体系中的核心节日，有着丰富的节俗内容。虽然春节在民国初年一度遭到禁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被“革命化”的字样损害，但在民众的强大心理需求之下，春节依然是时间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期间，交通线上人如潮涌，城乡之间几十亿人次的人口大移动，构成了当代中国节日民俗的一大景观。“一年不赶，赶年三十晚”，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回家的路虽然拥挤、漫长，可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痛苦并快乐着。回家的感觉真好，那里有妻儿老母、兄弟姐妹，还有祖先的庐墓、熟悉的乡土。一旦到家，在亲情的滋润下，路上的辛劳与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人们回家不仅仅是一次亲情的聚会，一次礼物的馈赠，重要而深刻的是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与伦理关系的更新，这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政府的责任是让亿万同胞在春节期间享受安宁与祥和，让亿万流动人口成为城乡之间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凝聚人心的文化力量更重要，春节就是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之一。

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中国主体民族中传承了两千多年，现在许多少数民族也过春节，人们将自己的感情、愿望、伦理、信仰都凝聚在这一节日上。春节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它被广大人民充分价值化，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与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

2. 春节是滋养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传统的节日民俗形态，面临着新的更加深层意义的挑战。新型的外来节日，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它洋气、新鲜、时尚，因此也就对不少城市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如圣诞节，在宗教信众与外企员工的引领下，加上商家的炒作，越来越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并具有中国色彩的现代节庆活动。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传统春节社会地位的下降。造成春节社会地位下降的因素十分复杂，但对春节意义、价值内涵理解的偏差与春节民俗知识的缺乏，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人说：“过年不就是吃吗？我们现在天天过年”；也有人说：“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鞭炮不能放了，娱乐只剩下一台春节晚会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找不到过年的感觉，人们失去了以往盼望过年的激动情绪。旧时的热闹与温馨在哪里？人们在寻找、在思索，有时不免迷茫。但很多人并没有真的对传统文化产生厌倦，而是觉得我们在传统文化建设方面做得太少，不能满足人们新的文化需要，人们的抱怨与牢骚不正体现着他们的一种精神渴求？

一种事物是否为人们接受、认同，就看它是否具有认知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春节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传统，说它特殊，因为它不像一个普通的物件，可以简单地替换或改变。我们可以轻易地脱下长衫，换上西装，但很难改变我们的肤色、语言与思想，春节也一样，想改变它没有那么容易。在中国历史的文化长河中，没有绝对的割裂与创造，文化传统的变化在新旧交融中实现，流动的传统总有一种迷人的力量。

虽然从起源与流传历史上看，春节与农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适应当代社会。历史是流动的，今天与过去处于同一时间之流中，传统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是动态的，它本身也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优良的节俗传统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相

反，它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的调节与辅助作用。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依然需要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温馨节日，以满足我们精神慰藉的需要。享受家庭的和睦，享受亲情的温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这样的节日内涵与形式如何会与现代生活发生矛盾呢？要说矛盾，只能说明我们对生活的本质没有足够的认识。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除了一般的生理满足外，我们还需要文化的归属与心灵的安顿。在信奉耶稣基督的西方社会，人们以圣诞作为盛大而神圣的节日，他们在圣诞节日仪式中获得精神愉悦。而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同样的文化功用，只是春节更充满家庭伦理色彩，人们奉祀家族祖先，亲人聚会欢乐，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润交融之中得以升华。

3. 春节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

春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它不仅需要呵护、珍视，更需要经营。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资源，只要我们经营得法，它就有着巨大的文化增值潜力。在全球化与商业化的浪潮中，春节的变化正在发生。以家庭为依托的春节，也因为大家庭的减少与缩小，面临着节俗重心向家庭与社会并重变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将春节期间的家庭民俗与社会民俗衔接协调，重视传统节俗中固有的凝聚家庭社区的因素，对传统节俗进行传承或创造性的转换。比如大年初一，在居民小区由居委会或业主联合会出面，举办新年团拜会，让平常少有来往的居民有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他们感受到近邻的友善。正月十五元宵节，自古就是一个城市社区的节日，它强调居民的室外庆祝活动，观灯看人是传统的民俗节目。对于今天的社区居民来说也是难得的交往机会，假面舞会，游逛街景都

是不错的节日活动项目。当然，春节传统民俗的传承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重视传统中具体的年节民俗事项，正是春联、年画、鞭炮、龙灯、狮舞、团圆饭、拜年、庙会、社火、压岁钱、年节礼物等等年俗细节共同营造了年节的祥和氛围。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用心建设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对一些传统民俗项目不要简单的禁止。值得反思的是近年来我们认识到了部分节日传统的价值，但因为具体措施不得当，反而使一些节日变得不伦不类。比如春节庙会，春节逛庙会本来是城里人最兴奋的年俗之一，人们在庙会中可以品尝地道的风味小吃，买到质量不错、价格便宜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奇玩具，欣赏到各种令人目眩心跳的杂耍把戏。但现在的庙会在行政管理部门与商家的过度关注下，成为积压商品处理地，小吃也让人失去了品尝的冲动，娱乐杂耍更是少之又少，项目无新无奇，而商家又缺乏诚信。这样的庙会，自然失去了吸引赶会人的魅力，很多人不愿意逛庙会了。如何将人民的庙会还给人民，让今天的“鸡肋”变成明天的“香饽饽”，真的值得城市管理者思考。



◆万户春声

春节是民众一年一度的情感、愿望释放日，作为管理部门应该尽量创造条件，并积极地将现代社会生活的新内容融进传统节日之中。作为当代的国民，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最好多一份敬畏，用我们的身心贴近传统，去感受、体味春节民俗中的温馨，同时也需要我们对春节民俗的意义进行阐释，让春节在更多人的心中得到重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文化多样性中闪现出民族文化的光彩。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已经与西方世界非常接近，让我们在精神上保持独立，是当今时代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要求。

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服务现实社会的文化资源价值，对这些特殊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该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状态结合起来，让传统的文化因素有机地融入现代文化生

活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文化保持着古今关联的特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会拥有恒久的前进动力。

4. 春节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在全球化的今天，春节已经跨越国界，它不仅是我们本土的文化节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增强，随着华人遍布世界的脚步，春节也正成为世界许多地方共享的文化节日。2005年，美国纽约州州长签署法令，将春节列为法定假日，规定在政府、公校工作的华裔与有此需要的亚裔，可以休假一天。鸡年春节，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等多国政要纷纷向中国人民和华人发表新年贺辞，联合国秘书处也首次为中国春节举办了文艺晚会。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春节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春节凝聚家庭、族群的特殊价值，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同与欣赏。当然，华人春节与国内春节相比，可能有适应地方文化环境的新变化。比如加拿大温哥华的春节，就有桑巴舞、拉丁舞、二战老兵团队表演等，但主体仍然是中国味的春节，有舞龙舞狮、高跷、锣鼓，吃团圆饭、拜年等内容。中国新年的喜庆、团圆、幸福在这些节俗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春节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中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享受、保护、展示春节文化正成为一项人类共有的责任与义务。作为中华文化的传人，我们正在为世界传承文化。